

10126--30503020

分类号_____

密级_____

U D C_____

编号_____

论 文 题 目

察哈尔地区的商业与城市近代化(1840—1935)
—以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城市(镇)为中心

研 究 生: 付丽娜

指导教师: 牛敬忠 教授

专 业: 中国近现代史

2008 年 5 月 20 日

原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除本文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内蒙古大学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付丽娜 指导教师签名：牛敬忠
日 期：2008.5.27 日 期：2008.5.27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使用承诺书

本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内蒙古大学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全部内容或部分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构、部门送交学位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也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为保护学院和导师的知识产权，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属于内蒙古大学。作者今后使用涉及在学期间主要研究内容或研究成果，须征得内蒙古大学就读期间导师的同意；若用于发表论文，版权单位必须署名为内蒙古大学方可投稿或公开发表。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付丽娜 指导教师签名：牛敬忠
日 期：2008.5.27 日 期：2008.5.27

察哈尔地区的商业与城市近代化（1840—1935）

—以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城市（镇）为中心

摘 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用武器打开中国的国门,中国各个层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由沿海而内地,由内地而塞外的变化对近代察哈尔地区的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阐述了近代以来察哈尔地区社会变化的一个层面:商业与城市。本文阐述了在察哈尔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镇):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兴起发展的过程中,商业因素对城镇的影响,以及在近代资本主义的推动下的近代化过程,提出了三个城镇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近代化的程度不一;介绍了察哈尔地区商业发展状况,从边塞地区的主要交易商品:粮食贸易、牲畜贸易以及日用百货入手,概述了本区域商业贸易特色;对察哈尔地区商业贸易系统进行了分析,以城市为中心的贸易系统,以集市、庙会为基点的基础市场构成了察哈尔地区的市场体系;阐述了活跃于商业领域的商人、商号是商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描述了商号在察哈尔地区的经营形式上的特色,并对商人的社会归属行业组织的发展演变作了概述,分析了行业组织在近代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整合。

关键字: 商业, 城市近代化, 近代, 察哈尔

COMMERCIAL AND URBAN MODERNIZING OF THE CHAHAR AREA
(1840-1935)——TAKE ZHANGJIAKOU, DOLONNUR, BEIZIMIAO
THREE BIG CITIES (TOWN) AS THE CENTER

ABSTRACT

Since the modern times, have used force along with the Western country open China's entrance, Chinese each stratification have had the unprecedented change. This change by coast to outside inland. the change have certain influence to the Chahar area society.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the Chahar area society change: Trade and city . the Chahar area has the representative city (town): Zhangjiakou, the Dolonnur, Bei Zimiao the commercial factor has influence to the cities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s well as capitalism's influence's modernizing. It proposed the modernizing degree is vary, briefed the Chahar area commercial development condition, from frontier fortress area main transaction commodity: The grain trade, the domestic animal trade and the daily use articles to outline commercial trade characteristic; It carried on the analysis to commercial trade system, take the city as the central trade system, the rural and temple fair constituted the Chahar area market system as the basic market; This article elaborated merchant and the company is the commercial development intrinsic power, described company's characteristic. And make the outline of merchant's society and analyzed the organization's social integration.

KEY WORDS: Commercial, Urban modernizing, Modern times, The Chahar Aera

目 录

引 言	1
一、城市的兴起与商业的发展	3
(一) 军事城市到商业城市—张家口	3
(二) 宗教中心到商业中心—多伦诺尔	11
(三) 蒙古游牧地到城镇贸易中心—贝子庙	17
二、城市与商业贸易	21
(一) 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商业中心的商品贸易状况	21
(二) 察哈尔区域贸易系统与市场结构	31
1、察哈尔地区区域贸易系统	32
2、察哈尔地区各经济贸易区市场结构体系	34
3、察哈尔地区各级市场结构具体分析	36
三、商业主体、组织的近代化	41
(一) 商业活动的主体—商号与商人	41
(二) 商业组织的近代转型与社会整合	46
结 语	54
参考文献	55
附 录	58
致 谢	64

引言

察哈尔地区是一个历史名词，是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变动的一个区域。从历史渊源看，它是清代蒙古族察哈尔部落的游牧地。习惯以察哈尔来命名地区，是从1913年北洋政府设立察哈尔特别区开始。1928年南京政府将特别行政区改为察哈尔省。在这个过程中地域范围发生了一些变化。出于研究的需要和便利，本文所指察哈尔地区是以察哈尔省的行政区划为范围，包括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口内十县，以多伦为中心的口外六县及锡林郭勒盟十旗、察哈尔八旗四牧群。^①

由于历史上察哈尔省存在时间短、政权更替频繁，社会动乱，地方经济文化落后，所留下的档案资料损失严重。因此限于资料有限，有关察哈尔地区的研究一直都很薄弱。

从专著来看，对察哈尔地区的研究很少。有金巴扎布的《察哈尔蒙古族史话》，（丰镇印刷厂，1989年）在这部著作中着重介绍察哈尔地区蒙古族的社会状况；其他著作，如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乌云格日勒《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卢明辉 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也涉及了一些关于察哈尔地区社会状况。

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察哈尔地区的研究可分为三个方向，一是以察哈尔蒙古族为研究对象，对察哈尔蒙古族的由来、变迁、风俗、教育、对西北边疆经济开发的作用，以及在清朝统治以来对察哈尔蒙古族的政策的研究。^②二是以蒙汉互市、对俄贸易以及旅蒙商的研究为主。^③三是以张家口、多伦、贝子庙城市（镇）为研究对象，主要从文物考古的角度来论述，概括性的介绍了城堡建设、规模和城内寺庙，这部分的研究较前两部分少之又少。^④上

① 牛敬忠：《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察哈尔地区行政控制的加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② 这方面研究的主要文章有：连琳：《元明清时期察哈尔察哈尔蒙古族的文化教育》，《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吐娜：《察哈尔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1期；韩香：《清代察哈尔蒙古族的西迁及其对新疆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王艳春：《试析察哈尔汗妻妾风光再嫁的原因》，《满族研究》，1999年第3期；云和义：《清朝察哈尔游牧八旗草原生态环境保护较好原因的探讨》，《内蒙古农业科技》，2001年第5期；加·奥其尔巴特：《察哈尔部源流浅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

③ 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崛起》，《北方论丛》，1999年第5期；许檀：《清代后期晋商在张家口的经营活动》，《山西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李志强：《张垣晋商对俄贸易》，《文史月刊》1996年第2期；左宝：《山西“皇商”在张家口》，《文史月刊》，2001年第6期；钱占元：《旅蒙商的兴衰》，《塞外春秋》，2005年第6期；张百路：《旅蒙商经营之道及其启示》，《北方经济》，1996年第5期；李易文：《清中后期蒙古地区的对俄茶叶贸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4期

④ 杨润平：《张家口堡的堡城、楼阁、关厢和街道——张家口访古之一》，《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杨润平：《张家口来远堡与蒙汉互市——张家口访古之二》，《张家口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高亚利，刘清波：《多伦汇宗寺的兴建及其演变》，《文物春秋》，2004年第5期；房建昌：《内蒙多伦县的历史沿革、宗教及其外文史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89年第6期；谷建华：《多伦县山西会馆》，《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年第2期；郭美兰：《康熙帝与多

述研究成果，一般将研究时段划定在明清时期，对进入民国时期这个地区发生的历史性的变迁研究很薄弱，只是进行了总体的概述，细致的研究很少。这与该地区史料有限有关，研究起来确有一定的困难。

我们选择以察哈尔地区作为研究对象，从区域角度入手，概述这个区域内部，在历史的不断发展变迁过程中经历的种种曲折和进步。并选择这个区域内部较有代表性的城市（镇）：以农业文化为内涵的张家口、以农牧结合文化为内涵的多伦诺尔、以游牧文化为底蕴的贝子庙为研究的切入点，就晚清以来至 20 世纪 30 年代，该区域商业发展的状况以及在商业的带动下，城市（镇）发展与近代化，我们试图呈现在社会变革中，该区域商业和城市（镇）在当时社会经济大环境下，在各种外力、内力的推动下所产生的近代化的趋势。

伦诺尔汇宗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4 年第 3 期；乌云格日勒：《清代边城多伦诺尔的地位及其兴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 年第 2 期；张汉君：《贝子庙建筑及相关问题探析》，《内蒙古文物考古》，1999 年第 2 期；房建昌：《清以来蒙古贝子庙及历世活佛活佛考》，《民族研究》，1994 年第 5 期

一、城市的兴起与商业的发展

察哈尔地区地处中国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落后未开化的边疆地区，直至近代人们还未改变对此区域形成已久的印象。从整个区域来说，该区域由于地近草原或本是草原辽阔地带，与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的发展确实存在很大差距。而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地缘条件，使这个区域经济发展呈现了明显的地域特色。因地理位置适中而发展起来的商业贸易，是这个地区经济发展中的亮点。在历史的长河中，区域商业贸易的兴起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具有商业机能的城市的发展。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商业经济发展的程度。二者相互依存、促进的关系在商业与城市发展过程中得到强化。察哈尔地区城市发展规律既表现为与内地城市发展规律的一致性，又表现为落后于当时内地城市的发展速度，尤其是进入近代以来，这方面的表现更加明显。现以察哈尔地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镇）分析商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

（一）、从军事城堡到商业都市——张家口

1、张家口商业的兴起

张家口位于（今河北省西北部）察哈尔地区南部，东临北京，西连大同，北靠内蒙古草原，南接华北腹地；是沟通中原与北疆、连接中西部资源产区与东部经济带的重要纽带。

张家口由于地处中原与蒙古地区的孔道，地理位置优越。明朝时期是中原抵抗蒙古入侵的长城边口，虽战事很少，但作为一个军事的边关形象让人肃然。“宣德四年，始筑堡城。”为下堡。^①下堡为军事防御而建，城内居民很少。由于城市主要是以防御的军事功能为主，限制了城市的其他功能发展。明朝隆庆年间，张家口开为马市，成为与蒙古通商的主要城镇之一。张家口开始具有了与蒙古通商的经济功能。此时的商业活动是蒙汉民族间的贸易，交易的物品很有限，仅仅限于满足蒙古民族日常生活用品所需，和内地汉人对马匹的需要。尽管如此，当时在张家口堡的交易数额很大，每年交易额仅马匹就达 18000 匹，值白银 120000 两。

^①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沿革，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① 随着互市贸易的发展和扩大，万历 41 年（1613 年）明政府在张家口堡以北修建来远堡，即上堡，专门服务于互市通商。大境门外“穹庐千帐，延绵数里，隐隐展展。”^②前来贸易的蒙古人在大境门外麇集。张家口对蒙贸易从此开始繁盛，吸引着众多的商人从事对蒙贸易。

张家口商业贸易繁盛是随着清朝定鼎中原开始的。尽管清政府对蒙政策一贯是限制性的开放，但民间的经济交流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张家口上堡，在清时称为“市圈”，“清之中叶，商贾辐辏，市面繁荣，殷实商号靡集市圈。”^③上堡的商号数量由“清初 80 家，道光年间 260 家，同治年间 530 家，民国初年仅大境门外的店铺就达 1500 多家。”当时的商业贸易主要是对内外蒙的转运贸易，最重要的一条商道是从张家口至库伦，即为著名的“张库商道”。张家口商业“迨清末张库通商，日繁一日，每年进出口约合平银一万二千万两，出口货物率为东生烟、砖茶、鞍鞮、皮靴、河南绸、铜铁杂货之类。入口货物则系大中小自生口蘑、皮张、驼牛羊毛、鹿茸、黄芪之类。运输全恃牛车骆驼。”^④可见张家口清末时期贸易数额之大，商业之繁荣。这条商道延伸可至俄罗斯的恰克图；东线可至热河、盛京；西线至绥远和山西。中蒙通商孔道的张家口对蒙贸易日渐繁盛，使张家口成为著名集散市场。

张家口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发展成为对内外蒙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同时也是西北贸易的中转地。在平绥铁路未开通以前，来自甘肃、宁夏的畜产品、药材、皮毛等货品，经绥远、丰镇，到张家口，再从张家口转运至平津各地出口；南方或平津各种商品也需经张家口转运至内外蒙古及更远的地方。张家口商业贸易从对蒙的单一贸易而发展成为多元的中转商业贸易。

张家口多元商业贸易伴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不断入侵，不断地打破传统商业贸易形式，商业贸易更加多元化。对张家口商业贸易影响最大的就是俄国。俄国早在 1689 年的《尼布楚条约》，1727 年的《恰克图互市条约》获得了在华经商的特权。清政府准许俄罗斯商队途经库伦、张家口进入北京，清政府支持的商队也以张家口、库伦为基地，至俄罗斯的恰克图从事贸易活动。清政府在张家口设立税关。转运商品的税收成为清政府的一部分财政收入。光绪中叶，《蒙古及蒙古人》^⑤详细记载了清政府对从欧洲输入的商品和蒙古土特产的征税标准。

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天津通商口岸的开埠，俄罗斯取得了更多在张家口贸易的权利，准许“俄国商人带着自己的商品经过蒙古去天津时，得到在张家口卸货五分之一以便与蒙古

① 李贵仁：《明清时期我国北方的国际运输线——张库商道》，《张家口文史资料》第 13 辑，第 110 页

② 《宣化府志》，艺文卷，《马市图序》，乾隆二十一年，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③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建设，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④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⑤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十章张家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706 页

人直接进行贸易的权利,并得在恰克图和库伦进行贸易的权利”^① 俄国商人还获得在张家口、库伦等处开设铺房、行栈,享受协定关税的特权。张家口元宝山通商贸易场即为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茶叶堆栈的集中地。^②从此,俄国的商业资本大量流入库伦和张家口,逐渐改变着张家口传统的经济格局。俄国的商品在逐渐增加,贸易额也在逐步增长。俄国商人在张家口的商业活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张家口经济的繁荣。

对俄贸易是张家口对外贸易发展的开端,俄国也是张家口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对象。后随着列强之间争夺的矛盾,俄国商业受到牵制,英、法、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打开张家口市场,使张家口的商业贸易进一步纳入国际市场,商业地位进一步提升。

清朝以来,是张家口商业发展的兴盛时期。张家口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张家口城市的崛起。张家口从一个军事城堡逐渐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城市。表现为城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市功能分区明确,城市的街区功能强化。

明清时期商业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张家口形成了上堡、下堡、元宝山三个商业区。在光绪中叶俄国考察学者波兹德涅耶夫记述了当时这三个商业区内部的布局情况。^③

上堡又称市圈,是张家口最主要的商业区,也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集中点。”上堡的面积很小,“长不过二百俄丈、宽不过一百俄丈。”相当于城周长 2 里许。上堡内部“东西两侧是两层楼的商行和货栈;南边则是一幢幢大石头房子,全是货栈……北面城墙上是格萨尔庙”在恰克图从事贸易,和在蒙古草原北部销售茶叶的晋商都在此设有商行和货栈;商人从俄国输入的呢绒、绒布和毛皮制品先运到买卖城的货栈,然后批发给下堡,最后再运往中国本土。上堡有祥发永、匡全泰、恒隆广等十几个大商号。沿着上堡的城墙,“是一个挨着一个小铺子,大多数住在张家口的汉族手艺人开的。”在清末时期,张家口上堡地区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商业格局,商业主要以对俄对蒙的中转贸易为主。

下堡是张家口最为古老和富庶的商业区。批发商的住宅和商行大多集中在纵贯南北的武城街。这些住宅都有巨大的仓库,贮存批发的货物。下堡较大的商号有大新德、大亨玉、大德公、天太德、复兴隆、永兴隆等。他们不但经营零售商业,也与附近的蒙古各旗进行贸易,并划分了各自的活动范围。一般经营赊货交易,蒙古人每次可赊取三五十两至一百两的货物。各商号派伙计到草原上去收账,一般是三月出去,八月回来。作为账款带回张家的主要是绵羊,也有牛马骆驼。“绵羊被赶往北京和太原府出售,马匹卖往河南、山东,骆驼则卖给从通州运茶叶到张家口的汉人”。下堡北部集中着皮革作坊和皮匠铺,依次向南为木器铺、蒲草

①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1860年中俄《天津条约》、《陆路通商章程》,三联书店,1957年,第147页

②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十章张家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95页

③ 以下未作标注的均转引自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十章张家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

铺、马车作坊、面粉铺等。

与上堡相比，下堡的店铺全是经营单一商品的，店铺规模也比上堡要大。下堡还聚集了很多钱庄、票号，都是山西商人开设的，垄断着张家口的金融业。张家口的银库、仓库和大部分政府机构集中在下堡的内城里。下堡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至清末时期，已经完全从一个军事城堡转变为以商业、金融业为主的商业城区。这种转变至民国时期更为明显。

在上堡和下堡之间，是满洲八旗的驻防营地和校场，商人经营的盐栈和碱行也聚集在此。著名的盐商有德懋碱店、合成碱店、德恒碱店等十家。

大境门外的元宝山是张家口的又一商业区。这里鳞次栉比地排列着长达 1 俄里的店铺，这些店铺多是山西商人和北京商人开设的。供应张家口日用所需的肉类、面粉、燃料等商铺多集中在此，俄国商人的住宅和茶叶堆栈也集中在这里。元宝山商业区在张家口市区的最北部，距离市区较远的郊区，是提供市内生活用品的主要地区。这是城市功能分区强化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

在元宝山和大境门之间的“坝岗子”是张家口的牲畜贸易市场。秋冬两季，每天都有口外的蒙古人，特别是察哈尔和苏尼特人把几百几千头牛羊赶到这里出售。五六月份是马匹贸易的旺季，每年销量有 15000 至 30000 匹，买主大多来自湖南、湖北以及更南边的省份。

张家口从军事城堡转变为传统的商业城市，动因就是商业经济的繁荣。

2、张家口城市的近代化

民国建立，气象蔚然一变。张家口对俄贸易、对蒙贸易以及中转贸易进一步发展。1918 年前，张家口商业基本沿袭了清朝商业发展格局。此时商业发展稳定，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繁荣阶段。张家口“商务尤盛，贸易额达一万五千万两，计进口八千万两，出口七千万两，是为张垣商务鼎盛时期。”^① 1920 年，外蒙古独立，1924 年，俄国控制外蒙古，中国商人被排斥在对外蒙商业之外，1929 年，“中国商业完全为外蒙政府没收，总计商务损失在一万万两以上。”^② 对外蒙贸易的断绝，严重影响张家口商业的发展。而对内蒙古市场开发不足，垄断性不强，以及产品供应和需求不足，制约了张家口商业发展的进程。张家口商业开始衰落，张家口城市发展却开始出现近代化的趋势。

城市近代化是指城市由传统的封建封闭型向近代以工业化、民主化为主要特征的开放型城市转化。张家口城市近代化主要表现在：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城区突破了城墙的限制

① 杜庚尧：《张库通商》，第五篇张垣金融之今昔，天津大公报社，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第 37 页

②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沿铁路延伸，形成了新的商业区；城市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人口涌现，商业从业人员比例大；城区空间结构功能分区明显，近代金融机构出现；近代城市公用事业开启；城市房价、地租显著变化等。

1)、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的变化

张家口城市发展除了受商业发展的推动外，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张家口城市近代化影响很大。表现为城市空间结构的变化。铁路通车前，张家口城市城区主要集中在上堡和下堡之间，商业区在城墙以内。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政府修建京张铁路。在火车站修建时，本地大商家纷纷就在火车站周边抢购地皮，大兴土木，新的建筑群迅速形成。在火车站西南角一带修建了怡安大街、长安街、保善街、长寿街四条商业街。并在街道后边与火车站周围建筑民宅 6000 多间。宣统元年（1909年），京张铁路通车后，又兴建了张家口东安市场、福寿街。^① 火车开始运营时候，商业街道格局已成。城区突破城墙的限制沿铁路延伸，形成了新的商业区——桥东区。

张家口因商业、运输及通讯方面的良好条件，在 1914 年自开为商埠。自开商埠即自行在城市中划出一部分土地，统一按近代城市发展要求进行规划、建设，使这一地带迅速繁荣，成为城市近代化的先行地段。张家口商埠设在桥东区，东界东山坡，南界京绥火车站，西界定边河，北界山麓，南北长 4 里，南宽北窄，南面的宽度约为一里半，北面约半里。^② 商埠的开辟，扩大了桥东区的面积，从 2 平方公里扩展至 4 平方公里。商埠连接商业区和郊区，带动了郊区的发展。张家口商埠除了依赖原有的市政基础设施外，在进行规划时候，提出了开埠与兴修水利工程并举的设想，并在商埠内设立电灯、电话、邮局等设施。这些设想随着开埠的进行一一实现。张家口开埠后，加强了与外部经济、文化的交流，城市商业贸易更加发达。开埠后，“计大小商号不下七千家，……每年全市进出口达三万万元。”^③

城市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集中表现为工业化。张家口开埠后，各种官办或商办的工业陆续设立。北达制面公司、察哈尔省立皮革厂、德泰隆毛化工厂、官立平民简易工厂、华北电灯公司等。^④ 这些近代企业的创办使城市由过去的单纯的消费型结构向生产型结构转变。

人口的增长及各类从业人员的数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近代化的程度。因史料有限，关于清朝时期张家口人口数量的变化，没有相关史料进行论证。据学者估计，在 17 世纪后期，张家口人口总量估计在 5 万以内。^⑤ 1912 年，张家口民商户为 15856 户，人口数为 132621

① 刘振琪：《张家口历史文化丛书——兴盛的古商道》，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 年，第 44 页

② 宋哲元等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沿革 张家口，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③ 杜庚尧：《张库通商》，第五篇张垣金融之今昔，天津大公报社代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第 37 页

④ 《察哈尔省资源调查张家口班报告》，黑龙江档案馆：《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2 页

⑤ 杨润平：《张家口开埠与城市近代化的起步》，《城市研究》，第 21 辑

人。^① 人口增加了近三倍。现将 1912 至 1930 年张家口人口变化作一比较。

年份	1912 年	1921 年	1925 年	1930 年
工商户数	15856	14865	12870	16624
人口数	132621	66735	69881	78036

此表据《万全县志 张家口概况 户口》整理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张家口的人口数量在民国初期最多，达到 13 万，这个时期是张家口商业最繁荣时期。1921 年后，张家口的人口数停留在 6 万至 7 万之间。张家口商业人口占城市人口比例大。张家口在民初时，“商户数几占民户数二分之一” 1921 年后，“商户数不及民户四分之一”。^② 尽管由于兵灾匪患、灾歉连年，张家口从商人口比例下降，可商业人口与其它乡镇相比较，还是占有很大的比例。商业人口在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体现了商业在推动城市近代化上的作用，也进一步说明了张家口城市近代化的程度。

进入民国以来，张家口城市的功能和结构进一步强化，并体现了近代的特色。张家口下堡商业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张家口金融业的勃兴，促使张家口形成了近代银行与传统钱庄、票号三足鼎立的格局。1923 年以前，张家口票号、钱庄已多达 42 家，^③ 在堡子里的棋盘街、鼓楼东街、锦泉兴巷、书院巷、东门大街设有裕源生钱庄、复兴成银号，宏盛票号等几十家传统金融机构^④ 随着近代银行的入驻，在下堡的鼓楼西街设有中国交通银行，棋盘街设有中国银行，西北银行、边业银行等近代金融机构。张家口金融业呈多元化与近代化趋势。

上堡除了旧有的商铺外，随着张家口政治地位的提高，逐渐向行政中心转变。上堡设置有察哈尔省政府、财政厅、民政厅、建设厅、教育厅及各级省立、区立学校。^⑤

民国时期的张家口成为了具有政治、经济、金融为一体的多功能型城市。

张家口街区体现了专业化的功能分区。城市街区许多街巷是因某类店铺或加工作坊相对集中而得名的。如卖粮食西粮房巷，卖肉的肉铺巷，卖口碱的碱点巷，加工土陶器的瓦盆窖，烧酒制醋的缸房巷，编制商品包装的编篓街，开杂货店的永茂巷、，经营茶叶的老茶店巷，经营票号的日升昌巷和锦全兴巷，开当铺的当铺巷，圈养骆驼的东骆驼号、西骆驼号，圈养马匹的南马圈，小马场等。一些富商巨贾的宅院成为标志性建筑而被命名为街巷的名称，如范

①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人口，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②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人口，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③ 宋哲元等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卷二十三执业编，商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④ 刘振瑛：《张家口历史文化丛书——兴盛的古商道》，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 年，第 43 页

⑤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官署，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家大门、池家大院、刘家大门、通行里（原为佟姓里）。宅院、街巷名称直接与商业联系，一方面反映了张家口商业文化浓厚，商人在当地的经济实力很强，另一方面说明张家口商业、手工业经营形成了功能分区，方便城市管理，在城市管理上迈出了近代化的一步。^①

2)、近代公用事业的发展

从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来看，张家口自清以来，虽商业兴盛，街道商店栉比，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却很落后。在光绪中叶，张家口上堡大门街“只有少数的地方铺着石板，别的地方则是黄土路面，大车在这种黄土路面上压出的车辙达十俄寸之深。这些坑洼几乎每天都被倒上各种垃圾……一遇下雨天，大门街就变成一片烂泥塘，使人寸步难行；而不在下雨天的季节，街上又尘土飞扬。”^② 面对这种不堪入目的状况，进入民国后，政府在城市基础建设方面投入了一定的精力。

辟造路桥。^③ 1925年，张家口市政筹备处，整顿了边路街、上东营、大门街、长清路、通蔚路各街市马路，并整修了清河桥、玉带桥、西太平桥、美人沟桥、西壑子桥桥梁，交通条件相对得到改善。

辟设公共设施。^④ 为了满足市民的闲暇生活，张家口市开辟城市公园（中山公园），修建供市民健身运动的运动场，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

开办电话、电报、邮政等通讯事业。在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信息起着日益重要的角色，通讯业在张家口起步较晚。1917年，张家口始有电话局，总局设于下堡，分局设于上堡，至1929年，各县均设有分局，互能通话。电报在张家口有两处，总局设于上堡，分局设于下堡。邮政局设于桥东长安街口，在各条街，分设邮筒，便利商民。至1930年，张家口至北京、天津、库伦的电话、电报、邮政系统形成。通讯条件的改善，通讯事业的发展加速了张家口经济及其腹地经济的发展，增强了张家口与其他城市及其腹地之间的沟通，强化了张家口的辐射能力，推进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改善交通设施。交通设施的改善对城市辐射范围的扩大，城市商业机能的发挥作用很大。1909年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的京张铁路的开通，张家口运输条件得到根本的改变，商业成本有所降低。1918年，平绥铁路全线开通。张家口“扼平绥铁路之中点”^⑤，西北转运中心的地位巩固。1929年，察哈尔省准备修建张多铁路，对于张北、宝昌、沽源、多伦等口北

① 刘振琰：《张家口历史文化丛书——兴盛的古商道》，党建读物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②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十章张家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0页

③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八 政治志（下）交通整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④ 同上

⑤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建设，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各县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后因财力不足而放弃。^①

汽车路的改善和汽车公司的组建。1907年，欧洲汽车拉力赛途径张家口，地方政府将张家口至库伦、恰克图的驿道初步整修，成为国内最早能通汽车的道路之一。1917年，由商人景学铃、碾祖萌等人集股合办了“大成张库汽车公司”，^②开辟了我国西北通行汽车运输的公路线路——张库公路，汽车由张家口直达库伦。此后，张家口先后建立多家汽车运输公司“迄十三年，车行居然增至三十余家，有车一百五十余部”，^③成为国内有数的公路运输中心之一。除了张库汽车路之外，张家口汽车运输公司开辟了张家口至北京、张家口至多伦、张家口至百灵庙、张家口至贝子庙汽车路。汽车路的开通大大缩减了运输时间，加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汽车开始替代传统的牛车、骆驼等运输工具。汽车、牛车、骆驼队相伴在商路，构成了民国时期的特色景观。

房租、地价的变化是了解近代城市发展的一个侧面。现将张家口房租、地价的变动做一比较。^④

房租	铺房		民房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09以前	大钱七八十千	大钱三四千	大钱七八千	大钱一千余
1911—1927	洋120—130元	洋50—60元	洋14元	洋5—6元
1927—1935	洋60元	洋10—20元	洋8元	洋3—4元

地价	园地（每亩）		旱地（每亩）	
	最高	最低	最高	最低
1909以前	大钱四五十千	大钱三千余	大钱三千	大钱一二千
1911—1927	洋110—120元	洋80—90元	洋30元	洋20余元
1927—1935	洋70元	洋50—60元	洋4—5元	洋3元以下

以上两个表格是张家口从清末以来30多年的房租、地价变动过程。其价格上涨的动因在与：“从平绥铁路修成以后，即由一小镇，渐进为华北之重要商埠，其商业之发达，人口之增加，交通设施之改善，较往昔有突飞猛进之势。”^⑤ 张家口商业地位提高使房租、地价也随之

①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八 政治（下）交通整理，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② 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大事记，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19页

③ 杜庚尧：《张库通商》，第四篇张垣五汽车路之沿革，天津大公报社，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④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房租与地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⑤ 同上

上涨。“超过其他乡镇一倍或数十倍以上”。^① 凸显了张家口商业城市的优势地位。而在 1927 年后，“中俄绝交，张库不通，加以本省灾歉连年，十室九空，致本埠商业日见萧条，商户倒闭者竟达十之三四，……彼时人口由十四万减至七万左右。”^② 因此房租、地价一落千丈。商业发展对城市发展的直接影响体现在房租、地价的变动上，反映了两者紧密的联系。

另一方面，地价的高低影响城市功能区域的划分。随着张家口城区的扩大，工业区从中心区分离出来，如张家口优势产业，皮革、皮毛、盐碱等产品的初加工都集中在离商业区较远的城边上，在市中心形成商业、金融中心的用地格局和功能区域。商业区、金融区集中在地价高的市中心，商业、金融区的形成刺激了地价的上升。张家口堡子里清末以来，聚集了众多的商家和金融业主，在共同的商业圈中互相合作、竞争，形成了浓厚的商业文化氛围，堡子里是张家口地价最昂贵之处。

张家口桥东区因铁路修建而起，成为继堡子里之后兴起的另一个商业区。桥东商业区的形成为居民购物提供了方便。对于在堡子里房价高，很多居民选择在此建筑房屋，实现了在地价昂贵的商业中心不能实现的方便。张家口桥东怡安大街、仁寿大街就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形成的住宅区。在桥东商业区内的商家往往比其他地区的商家具有可观的收益，因此，一些商家争相进入桥东商业区，使商业区的商家更加密集，促成了张家口桥东商业区的形成。

（二）、宗教中心到商业中心—多伦诺尔

1、宗教中心地位的确立

多伦诺尔位于察哈尔地区东南部，东靠围场，南临独石口，西南界太仆寺旗，西界正蓝旗，东界赤峰，北界林西县。距张家口 470 里，距北京 765 里，是华北通内外蒙古的交通要道。

多伦诺尔在清初确立了在内蒙古地区的宗教地位。清朝建立，一统天下，蒙古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却挑起战争，追击喀尔喀部，攻入内蒙古境内。康熙皇帝亲自出征，平定噶尔丹叛乱。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康熙帝亲赴多伦诺尔草原，召见进入漠南的喀尔喀外蒙三部首领和哲布尊丹巴活佛，以及内蒙古四十八旗王公，共谋北部边疆安定，商讨国家统一大计。史称“多伦诺尔会盟”。^③ 在这次盛会上，康熙帝决定在多伦诺尔建立一座藏传佛教寺庙，由内外蒙古各旗各派一名喇嘛住持，每年或间隔一年在庙内举一次大会，各旗扎萨克及

① 同上

②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房租与地价，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③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年，第16页

王公贵族集会向朝廷述职，朝廷也可在此对各部进行安抚。此后，内外蒙古各旗王公贵族年年集会于多伦诺尔，后来清王朝赐寺名为汇宗寺。同时清王朝迎请西藏活佛章嘉呼图克图驻在汇宗寺，主持内蒙古境内藏传佛教事务。雍正十（1731年）年时，在汇宗寺西南方新建了一座大寺庙，赐名为善因寺，以供继任章嘉呼图克图驻扎。^① 两大寺院的建立，藏传佛教的四大领袖之一的章嘉呼图克图主持宗教事务，使多伦诺尔一个声名不扬的草原游牧地一跃成为漠南宗教中心。

2、多伦诺尔商业贸易的繁兴

多伦诺尔的商业最初是为了满足内地工匠的需求而发展起来，多伦诺尔寺庙的扩建、宗教地位的确立，使多伦诺尔的商业贸易需求进一步扩张。为了稳定蒙古贵族以及满足他们的日常生活所需，一度中断的定期商业贸易得以恢复，清政府放宽政策，允许内地商人进入草地经商。众多商人在此聚集，商业贸易发达。

在多伦诺尔的商人以山西、河北、京津为主，分燕、晋两帮，晋商占据商业优势。

多伦诺尔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地处中原与草原的交接地，自然成为转口贸易的中转地。多伦诺尔的贸易范围极广，从内蒙古的各盟旗，尤其是从锡林郭勒、昭乌达、哲里木各盟旗到外蒙古库伦，并延伸至俄罗斯的恰克图等地；从察哈尔八旗至呼伦贝尔。商人经营的行业很广，从牲畜皮毛、蒙盐、药材等蒙古特产，到绸缎布匹、烟茶、粮食杂货、金银珠宝等内地产品，以及宗教用品。

多伦诺尔商业的繁兴，带动了草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多伦诺尔“以喇嘛庙之名，播于远近，商贾踵集，土地益盛，成巨然一大都市”^②。蒙古族朝拜者以及汉族商人的增多，构成了多伦诺尔的流动人口与定居人口，进而促成了草原城镇的形成。汉族商人在上都河左岸定居下来，形成了兴化镇（旧买卖营）。在康熙四十年，城镇达到“南北长四里，东西广二里”^③的规模，城镇内设有兴盛、福盛、义合等13条街。乾隆六年（1741年），在兴化镇的北面建新盛营，称为新买卖营。新营“南北长一里，东西广半里”，^④设有柔远、宁人等5条街道。新旧两营连接起来，构成了多伦诺尔南部城区。乾隆十九年（1759年）多伦诺尔蒙古王公招佃放垦，排号划地，在多伦诺尔附近形成了自然村落，奠定了多伦诺尔周围农村郊区的基础。

光绪中叶，商业达到最兴盛时期。商业的繁荣，促进了城镇格局的形成和稳定。整个城

① 同上

② 剑虹生：《多伦诺尔记》，载于1908年《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号，沿革及其地位

③ 金志章撰 黄可润补：《口北三厅志》，卷五经费志，乾隆二十三年，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

④ 同上

镇是以额尔腾河为分界线，额尔腾河的北岸是以两大寺庙为中心的佛家圣地，在额尔腾河南岸的买卖城是商业贸易场所。南部城区南北长东西窄，而且这种趋势在不断扩大。到19世纪末，这种趋势已到“南北长度是东西宽度的三倍”的程度。^① 佛教中心与贸易场所隔河相望，界限分明。在严格意义上来说，商业城镇所指范围应该是额尔腾河南岸的城区。在这个城区已经形成了以商品交易为中心的商业街、以城市管理为中心的行政区以及居民居住的住宅区。

多伦诺尔城镇最北端是政府机关所在地。政府机关设置在一条东西向、名为“头城街”的街道上。有管理民政事务的“二府”衙门，维护城镇治安的驻防军机关——“总爷”，管理监狱的“巡检”以及统管八旗军的“协台”衙门。^②

在头城街的南端，依次为三条功能划分明确的商业街区：马市街、牛市街、长胜街。马市街上集中了为商人以及到多伦诺尔来买牲畜的人提供住宿的客店，向贩卖牲畜的商人征税的税务署。牛市街分为钟楼前街和钟楼后街，钟楼前街有38家店铺。钟楼后街有39家店铺和专收皮毛税的税务机关。在钟楼后街尾部最主要的店铺是以制作佛像和铜器的店铺，著名的商家有：兴隆瑞、阿尤希铜匠铺。长胜街商家也以佛像作坊和铜匠铺为主。

在长胜街向南又有三条街道，其中的二成街是多伦诺尔居民住宅区，以绿营兵的住房为主。兴隆街集中了多伦诺尔最富有的店铺和货栈，以做批发生意为主，而且还是多伦诺尔金融中心，银号和钱庄也集中在这条街道。福盛街是手工业作坊汇集的街道，集中了毛毡、马衣、皮革、靴鞋、木器等手工作坊。毛毡作坊有20家左右，皮革作坊有20家左右。福盛街的南端集中了当地税务机关的分署，如征收茶叶税、布匹税和粮食税各分署。以上各街道是多伦诺尔的商业区。其他较小的街巷为围绕商业区形成的居民区住房。

在多伦诺尔城区内还形成了专门的交易市场。头城街与马市街等三条街区的空地，是多伦诺尔的牲畜交易市场，马匹和骆驼为大宗交易商品。东盛街是多伦诺尔的旧货市场，集中了三百家小店铺。

多伦诺尔城镇中的居民分布情况为：“户千五百六十七，口约二万，内有回教徒三千人，而居住者汉人而已，蒙人绝无住市场者”。^③ 汉人多是商人居住，直至民国初年，才有一部分商人家属和农户。商人家属和农户的定居，形成了城镇内固定人口，增强了城镇的消费能力，对于城镇商业、手工业都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20世纪以来，多伦诺尔的商业在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作为对蒙古交易的商品集散地，

①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二章多伦诺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30页

② 以下未作标注均引自《蒙古及蒙古人》第二章多伦诺尔

③ 剑虹生：《多伦诺尔记》，载于1908年《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号，沿革以及地位

它的功能更加强大。据《多伦县概要》记载^①：在清末至民国初年，多伦诺尔仅大商号就有一千多户，每年交易额据说有二千万。是多伦诺尔商业最繁盛时期。多伦诺尔因其有利的地理位置：背靠内外蒙古草原，地接新开垦农业区，辐射范围也在拓展。在民国初年，它的贸易辐射区域东到呼伦贝尔的满洲里，西达库伦及桑贝子，特别是与锡林郭勒地区交易极其繁荣。多伦诺尔在民国初年形成了相对固定的贸易路径。

(1) 张家口——多伦诺尔——乌珠穆沁——呼伦布雨尔

(2) 多伦诺尔——苏尼特——库伦——恰克图

(3) 多伦诺尔——乌珠穆沁——车臣汗

(4) 多伦诺尔——独石口——北京

(5) 多伦诺尔——赤峰——通辽

(6) 多伦诺尔——郑家屯——齐齐哈尔

商品一般是由张家口转运而来，分为南路、北路、洋货。南路货即为茶、糖、颜料、药材、磁、绸、海味等类，北路货为棉布、烟酒、干果、铁器、蓝靛等，洋货为火油、火柴、洋布、褙裤、洋皂等。^② 商品除由张家口转运，也有直接从北京、天津等地采买，运至多伦。

伴随着商业的繁荣，附属于商业贸易的手工业、工业加工业以及饮食业迅速发展。

道光年间，多伦诺尔有百余家各类作坊，仅福盛街有 63 家店铺，多数是皮衣、毛毡、木器、皮革等业。仅毛毡作坊就有 20 余家。1934 年，多伦诺尔有各类手工业作坊 250 家。^③

工业加工以民族产品为主，主要产品有：金银铜器、马鞍具、毛毡、蒙古靴、皮衣等，产品运销青海、甘肃、西藏、宁夏和内外蒙古广大地区。虽受时局动荡，商业利润被吸收的影响，在 1913 年，多伦工业民族用品加工仍具有一定的规模。输出绒毡 4600 块，毡帽 2600 顶，蒙古靴 8500 双，马鞭 5700 块，铜佛 140 件，毛毡 4700 块，毡鞋 3000 双，马鞍 2700 件，铜壶 2600 多件。^④

服务于商业的饮食业也随之兴起，1929 年，多伦有饮食服务摊点 97 家，资本总额 17381 元（银元）。^⑤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抢占势力范围；西伯利亚铁路、平绥铁路的开通，多伦诺尔市场受到冲击。

19 世纪末，俄国把东三省划为势力范围，东北三省成为俄国的原料输出地和俄国产品的

① 多伦县公署：《多伦县概要》，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52 页

② 刘驹兵：《多伦诺尔开辟商埠的调查报告》，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3 页

③ 卓孔铭：《多伦县志》，手工作坊，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 年，第 221 页

④ 卓孔铭：《多伦县志》，工业门类，民族用品，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 年，第 225 页

⑤ 卓孔铭：《多伦县志》，饮食，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 年，第 408 页

倾销地。严重影响呼伦贝尔等蒙古地区对多伦的产品输入，特别是在 1903 年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东蒙产品一部分输至平津等地，一部分直接被俄国吸收。平绥铁路的开通后，绥远、包头集散市场功能强化，吸收部分西蒙产品，多伦诺尔对蒙产品集散地的吸引力减弱。

1921 年，外蒙古独立，多伦失去了部分对外蒙的贸易份额，商业发展受滞，但尚可与锡林郭勒盟各旗通商，商业贸易额输入输出总计可达四千余万元。^① 对多伦诺尔商业打击最大的是 1929 年的中俄断交。受俄控制下的外蒙古驱赶在外蒙商人。与外蒙商业息息相关的多伦商业，受此影响，一落千丈。多伦诺尔的商号由民初的千余家歇业了六七百家，剩下的四百余家，资本微弱。全年的输出输入总计四百万元左右。^② 与 1921 年相比，相差百倍。多伦诺尔商业的衰落，多伦诺尔人口从 1922 年的 72220 人，下降到 1929 年的 49932 人。^③

1933 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多伦，成立伪县公署。1935 年，日本在多伦设立“察东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公署”。在日本统治多伦的 12 年中，多伦诺尔商业发展受制于日本军事的需要，商业发展几乎停滞。昔日的商业都市没落，只留下了宏伟的山西会馆、直隶会馆，与现实的衰落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商业的兴衰，极大的影响了多伦诺尔的发展。对于一个以单一对蒙贸易的城镇，虽以商业为发展基点兴盛起来，没有支柱性的工业作支撑，没有广阔的农业腹地为基础，最终在先进工业文明撞击中没落，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草原型城镇发展过程中极大的困惑，如何发展支柱性产业、基础性产业，是我们现在还在思索的一个问题。

3、漠南商镇的近代化

多伦诺尔是随着商业活动和商民增多而建立的城镇，不是一个建设比较规则的城市。除了寺庙以外，建筑物不甚讲究，住宅分布不齐，房屋简陋。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初，并没有多大改观。“街市中商民随意建房，并无整体规划，道路曲折，房屋凌乱。且路面多为土路，泥泞不堪”，^④“东西长四里，南北二里，周长 13 里余”。^⑤ 城区的面积也没有扩大。

随着商业的兴衰，多伦城镇也随之变迁，进入近代以来，呈现了细微的进步与变化。多伦诺尔商业聚集效应，使人流、物流向此地集中，人口，商号及资本集中于此。据光绪九年（1883 年）统计，多伦诺尔厅有“户九千三百九十六，口七万一千一百八十九”。^⑥ 1911 年，

① 多伦县公署：《多伦县概要》，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年，第 145 页

② 同上

③ 佐藤晴雄：《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41 页

④ 剑虹生：《多伦诺尔记》，载于 1908 年《东方杂志》第五卷第十号，沿革及其地位

⑤ 同上

⑥ 黄彭年总纂：《畿辅通志》，卷 96 经政户口，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 年

多伦诺尔厅人口增至“十三万余口”^①而随着商业的衰败，人流、物流、资本流相应的回流。

1922年至1934年多伦诺尔县城人口统计。^②

年份	1922	1923	1924	1925	1926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人口	7220	7214	7235	7232	6734	6906	4904	4993	4940	2094	1899	1046	2372
	0	2	0	2	6	4	4	2	7	4	9	0	2

在12年间，多伦诺尔城镇人口减少了5万人之多。多伦诺尔商业兴盛时期，嘉庆至道光年间有商号3000多家，^③到民初1000余家。1914年，商号歇业明显增多，仅有700余家。^④商号的资本由商业兴盛时期的几万元减至几千元、几百元。在多伦诺尔城镇内，一向繁盛的旗商商号资本骤减，甚至歇业或回流至相对稳定的区域。

多伦诺尔商业的衰落，对城镇的近代化影响很大。尽管如此，多伦诺尔还是迈出了近代化蹒跚步伐。多伦诺尔近代化主要表现在通讯业的发展、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

在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信息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近代通讯事业可帮助了解国际国内市场行情，了解同行业的信息，了解产品质量、价格、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因此一地的通讯事业的发达程度可以管视城市近代化的程度。^⑤

多伦邮政事业在20世纪初开始的。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多伦诺尔至宣化开辟了昼夜兼程步差邮路。随着商业往来紧密以及地区间行政事务交往的频繁，多伦诺尔拓展了邮路的广度和深度。1921年，开辟了张家口—多伦—林西—赤峰邮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多伦设立了“民信局”、“书信局”，开展函件业务。在宣统三年（1911年），多伦的邮寄代办所改称为邮局，办理平常和挂号信件，增办快递信函，称“加紧信件”。进入民国时期，函件的业务种类增多，方便了函件的收寄。蒙汉交易量的增多，使多伦诺尔的包裹业务繁忙，多伦诺尔邮局每月向张家口发一次包裹，运输工具为马车。

1917年，多伦诺尔电报南通沽源县，北通经棚、林西，东达热河、围场，电报的开通加强了多伦诺尔与这些地方的业务联系，巩固了商业网络，便利了商业往来。多伦诺尔长途电话业开始于1926年。线路是从多伦诺尔经沽源的通往张家口、天津。电报来往频繁。根据1933年多伦电报局统计，张家口与多伦间的商业电报占两成。从电报去来电次数可看出多伦

① 刘钟葵：《多伦诺尔厅调查记》，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② 佐藤晴雄：《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

③ 刘钟葵：《多伦诺尔厅调查记》，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

④ 多伦县公署：《多伦县概要》，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2页

⑤ 以下未作标注的根据卓尔铭：《多伦县志》整理

与张家口、赤峰、围场、承德、天津、北京来往密切。^①

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是城镇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1925年,多伦出现了汽车运输,运输路线是从张家口至多伦。1933年,开通围场至多伦至围场汽车路线。虽然汽车运输在多伦交通体系中所占比例很小,但是汽车运输路线的开通,大大改善了贸易地之间的运输条件,缩短了多伦与外界沟通的时间,提高了运输的速度,同时更加强了贸易地之间的联系。在汽车运输路线开通的同时,执政者致力于修建铁路,改善多伦诺尔的贸易环境。1927年,冯玉祥命下属修建张家口至多伦铁路,路线为:张家口经万全、张北、沽源到多伦,全长440华里。内蒙古华兴垦牧公司经理黄玉民用了两年时间完成铁路勘测设计、定线工程,打好施工标桩。当时多伦大商号争相购买火车站附近地皮,以备营业。后由于战乱及经费问题,这项计划被搁浅。^②但从进步意义来讲,新式交通运输工具作为改善城镇贸易环境划入城镇规划。

(三)、蒙古游牧地到城镇贸易中心——贝子庙

1、商业贸易的兴起

贝子庙(今锡林浩特),位于锡林郭勒盟中心位置,独具吸引力的牧场资源,是蒙古民族游牧的佳地。这种纯牧业的经济状态直至建国以后,也没有被打破。单一的牧业经济使居住在此地的蒙古人民有着迫切的交换欲望,以满足生产、生活的需要。蒙古族人民与汉族商人的贸易形式表现为明朝的马市贸易与清朝定期互市贸易。后多伦诺尔的旅蒙商人将贸易范围扩大到了锡盟各旗,旅蒙商携带烟酒茶糖等商品进入牧区,送货上门。

乾隆八年(1743年)贝子庙建成。随着贝子庙的建成和知名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旅蒙行商,每逢庙会、法会都会携货品前来与朝拜者进行交易。交换一般是以物易物,以有易无的形式进行。商人提供给贝子庙牧民的产品主要为满足牧民初级生产生活所需物品。1935年,日本人调查汉商向牧民输出的产品主要有:食物类有:白面、小米、莜面、炒米、红糖、白糖、冰糖、高粱酒、川砖茶、穿着类有:缎子、麻布、棉布、洋布,使用类:洋瓷盒、饭碗、电灯、洋蜡、烟草、铅笔等。^③贝子庙游牧地带,特产是牲畜及其畜产品,主要是羊、牛、马等牲畜及牲畜皮毛。牲畜及各种毛的出产期是五、六月至十月,皮类在十二月下旬至一月,每到这两个产品出产期,蒙古人民会携带产品到贝子庙、王府等地与携带杂货的汉商交换所

①木原林二:《多伦及郭家屯地方农业调查报告》,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99页

②居风库等主编:《锡林郭勒盟商业志》,大事记,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20页

③佐腾晴雄:《多伦、贝子庙并大板上庙会事情》,第二章贝子庙事情,铁路总局文书课,1935年,第84页

需产品。

除了庙会贸易外，行商选择每年畜产丰富的七八月和春节前的九十月以及来年的三四月份，携带牧民各时节所需物资走浩特、串敖包，与牧民直接交易。贝子庙商业流动，依赖行走于草原的行商。1933年，行走于贝子庙的行商主要是复兴振、永兴源、义兴魁。^①

民国以前，贝子庙有无坐商因史料有限不能确定。但可以推测，贝子庙在1889年建成，在贝子庙最盛时期喇嘛可达1200人，如此众多的喇嘛必有很大的消费能力，而1912年贝子庙人口有9171人，^②人口相对集中的贝子庙，应该有坐商来满足贝子庙的日常所需。民国成立，各大城镇的商号陆续在贝子庙周围定居下来，采购蒙古特产。各大商号主要以张家口、多伦、北京、经棚、林西商号最多。

1935年坐商在贝子庙营业状况。^③

地区	商号	品名							
		羊毛 (斤)	驼毛 (斤)	牛(头)	马(匹)	羊(只)	羊皮 (张)	马皮 (张)	牛皮 (张)
张家口	乾兴茂	4500	300	30	7	800	1000		
张家口	义成亨	4000	200	60	10	900	300		
张家口	义昌泰	2000		20	10	600	400		
张家口	世丰裕	2500		40	7	500	100	20	30
张家口	德寿隆	3000		30	4	500	300		30
张家口	裕兴厚	2500		20	5	500	300		
张家口	德瑞玉	1500		20	5	400	200		30
张家口	振泰号	3000	400		3	500	300		
张家口	久成合	5000			5	1000	500		
张家口	万成号	3000	100	40	4	500	600	30	100
张家口	复庆义	5000		20	5	2000	1000		
多伦	复兴振			10	8	400	300		
多伦	永兴元	10000		20	10	500	300		
林西	万成顺	3500	200	20			500	20	30

① 佐腾晴雄：《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② 《锡林郭勒盟志》，卷三人口民族，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27页

③ 佐腾晴雄：《多伦、贝子庙并大板上庙会事情》，第二章贝子庙事情，铁路总局文书课，1935年，第77页

林西	德润成	10000	200	30		600	2000	100	300
山西	义和德						500	20	30
经棚	裕兴	20000					4000	60	30
经棚	永盛源	2000					500	10	10
经棚	庆德元	10000				500	500	50	100
经棚	庆德正	1500		10		300	2000	30	200
经棚	瑞成义	3000			5	700	500	20	20
经棚	义和顺	3000		5		400	1000	80	90
经棚	义兴永						300		20
经棚	双义隆	500				30	50		
经棚	义聚长	800			2	5	150	53	15
经棚	恒升永	400		5		50	50	3	3
经棚	复新玉	500				50	200	10	10
北京	三义厚	7000	200		7	3000	200		200
北京	义和成	3000	500			3000	600		
合计		111200	5750	390	102	17735	18850	458	1578

上表为定居在贝子庙的商户，共 29 家。这 29 家都以经营蒙古特产为主，多是上述几地的分号。其中张家口商号有 11 家，多伦商号有 2 家，林西商号有 2 家，经棚商号有 11 家，北京商号 2 家，山西商号有 1 家，可见在贝子庙商业中，张家口、经棚商业实力最强。

贝子庙在民国以后，与各地商业联系日益紧密，其间，因对外蒙贸易中断，多伦诺尔作为对蒙贸易集散地的功能日益衰落，商业中心向贝子庙转移。贝子庙在民国时期商业路径东可达林西、赤峰，东北可达东北三省和外蒙古，南可通张家口。贝子庙与多伦诺尔、张家口、北京、克什克腾旗、林西、大库伦、阿巴嘎、东、西乌珠穆沁旗，苏尼特左、右旗等地的贸易活动日趋频繁。贸易范围的扩大提升了贝子庙在锡林郭勒草原上的商业地位，随着商业的日趋发展，贝子庙作为一个草原上新兴城镇兴起。

2、草原城镇的形成

随着商业的发展，1915年，贝子庙商业格局形成：^①以贝子庙为中心的东商、西商、南商三个商业贸易地带。这种商业格局一直延续至今，现锡林浩特人还在用这些名称来称呼方位，可见影响极深。

三个商业地带是围绕贝子庙为中心来布局的。商业地带分布在距贝子庙一定距离的范围内。贝子庙周围集中的上千间草房是喇嘛居所，是贝子庙最早的定居房屋，很少有商人及其家属在此居住。

东商以山西、河北、北京手工业者为主，这些小手工业者多经营皮毛、银铜、漆画、油木、建筑、饭馆等行业。其中银铜、漆画、油木、建筑行业多是服务于喇嘛寺院。这些手工业者多为历次建造贝子庙时，从内地来的众多工匠，在竣工后部分留了下来，成为最早的手工业专业户。分布在贝子庙东北15里的地方有皮袄铺4户；贝子庙东2里地方有：对蒙贸易商户、画匠、泥匠、木匠、铁匠、靴商等15户。

西商是位于贝子庙西南1里的18户商户。以北京、张家口商人为主，经营红货为主，即金银首饰、珠宝玉器、铜器家具、佛像法器、木碗供器、长靴、哈达、绸缎、鼻烟、蒙古刀之类。

南商位于贝子庙南侧“一棵树”，商人以克什克腾旗和林西县商人为主，南商主要经营日用百货类，即米面、茶、酒、布匹、绸缎、牛车、马鞍具等。分布在贝子庙东南18里有商户22户，东南30里有商户1户。

上述各商业地带商号，据《贝子庙事情》记载^②，贝子庙共有商户60户（有误，应该为59户）。其中对蒙贸易户29家，牛车店1户，皮袄铺4户，酱醋铺1户，木匠13户，泥匠2户，铜匠1户，铁匠1户，画匠2户，休业3户，共计59户。

商业功能分区的形成，说明贝子庙商业城镇规模具备。但商业规模小、体系不健全。经营品种主要为当地资源性产品，以及其服务于喇嘛庙和牧民基本生活需求的小商号。商业规模小，经营品种单一，处于商业初级发展阶段。

贝子庙从一个草原游牧地转型为草原贸易城镇，商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由于商业发展的需要，在草原游牧地渐成集镇，并形成了不同功能分区的城镇商业区，而围绕着商业区的中心，城镇人口越来越密集，在商业区周围聚集，渐成居民住宅区。当然，民国时期，草原上的城镇贝子庙不能与内地城镇相比，无论从人口数量、城市规模来说比不上内地

① 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第三十章锡林浩特市，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332页

② 以下未作标注均引自佐腾晴雄：《多伦、贝子庙并大板上庙会事情》，第二章贝子庙事情，铁路总局文书课，1935年

乡村。但对于长期处于游牧状态下的牧民来说，已经是城镇了：可以集中去买卖商品，并可定居下来。但当时牧民定居者很少，大部分居住在远离城镇的草原上。但草原城市的兴起毕竟给他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更方便，可接受先进的文化、思想。

小结

上述三个城市（镇）发展时代背景各不相同，发展轨迹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张家口是在清朝一统天下，结束中原与草原长期对立的局面，及蒙汉区域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从明朝一个长城卫口的军事城堡，发展成为清朝以来著名的“西北商埠”，民国时期成为具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功能的边疆城市；多伦诺尔凭借政治优势，从宗教中心逐步发展为具有宗教、商业功能的草原城镇。草原游牧地贝子庙因宗教而享有盛名。因远离开拓成熟的商道，属于商业附属地带，直至民国初年，商业贸易有所发展，城镇功能转化较晚。三个城镇尽管发展背景，发展轨迹各有特点，但在城市（镇）发展的过程中，影响其发展的一个共同因素就是商业贸易。越是到后期，这种因素的作用就越大。由于商业发展程度不同，规模不同，在城市（镇）近代化的程度上也呈现了不同的层次。张家口近代化程度最高，多伦诺尔次之，而贝子庙则没有近代化的气息，还处于古老的游牧社会。草原城镇贝子庙的近代化过程相对张家口、多伦诺尔来说，要缓慢得多。民国时期的草原城镇还谈不上近代化，只能说是个居民聚集点，贝子庙是在 1949 年以后逐步走上城镇近代化的道路。

二、城市与商业贸易

（一）、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商业中心的商品贸易状况

察哈尔区域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决定了经济结构的多元性。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口内十县处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接壤地带，地势较为平坦，气候较为温和，降雨较集中和充分，造就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口内地区的农耕文化特色，农业经济为本地区的支柱产业。

以多伦为中心的口外六县，地处内蒙古高原，气候寒冷，降水较少。该地区以经营畜牧业为主，随着清末的大力推广开垦，逐渐转为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

以贝子庙为中心的锡林郭勒盟，处于典型草原与草甸草原的结合地带，水草丰美，是蒙古民族游牧的佳地。几千年来一直传承着牧业文化的特色，产业以牧业经济为主。清末推广的开垦，对该地区影响很少。牧业经济是该地区的支柱产业。

察哈尔区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区位优势，形成了以农产品的粮食买卖、畜产品的牲畜贸易、皮毛交易为主的商业特征；由于地域辽阔，民众生产、习俗差异性较大，造就了日用百货交易最为频繁，商品交易数量大，范围广。本节以张家口、多伦诺尔、贝子庙三个商业中心为代表，就察哈尔区域内大宗商品：粮食、牲畜、日用百货贸易状况做一简单概述，以管窥察哈尔地区在民国时期商品贸易状况。^①

1、粮食交易

1)、粮食交易概况

察哈尔地处农耕区和牧业区的结合地带，在只有农耕区才能种植谷物的情况下，却要供应已垦地区和广大牧区人口食用，使粮食成为内外蒙古的珍贵商品。察哈尔所属口内十县是早已开发成熟地区，口外六县属于清末开垦区。口内十县农业生产成熟，粮食主要以谷子、高粱及小豆为主。口外六县粮食主要以莜麦、小麦及豌豆为主。^②

以口内十县农产为主要货源的张家口，口外六县农产为货源的多伦诺尔，成为粮食交易的集散地，粮食交易成为两地重要的商业活动。一般而言，张家口是整个察哈尔地区粮食的集散地，口内外各县的农产，通过骡拉马运输输入张家口。张家口作为商业大都市，人口密集，除一部分自销外，大部分通过多伦诺尔输往内外蒙古。^③多伦诺尔是口外六县的中心，除张北等地近张家口，粮食交易被张家口吸引外，多伦诺尔成为口外六县粮食的集散地，并转运张家口输入的粮食，分销至内外蒙。同时，多伦诺尔“粮米、菜籽除本地出产外，经棚及口外新开荒地多运此销售……米面销行内外蒙古数皆不资。”^④

口内外各县，距张家口、多伦中心城市（镇）路途遥远，交易不便。因此口内外各县之间，选择就近交易原则，来满足对粮食的需求。这样，在口内、口外各县之间，一般的县城或较大的城镇成了粮食交易中心。阳原县粮食交易中心，西以县城揣骨疃为中心，粮食交易可到山西阳高，东以东城为中心，可达蔚县西合营。平绥铁路通车后，在属于延庆县的康庄设立车站，康庄即成为延庆县粮食集散地，将延庆县所产的红高粱集中销售到北京等地。赤城县所产之谷、米麦、高粱、黑豆、荞麦等粮食多销往延庆县、怀来县、涿鹿县。怀安县的沙城为龙关县、赤城县一带粮食的集散地。万全县的洗马林是大同、丰镇等地进入张家口的运输要道。张北县的县城，每日开市，宝昌、沽源一带的粮食也多输入此地。^⑤各县之间粮

① 由于史料，尤其是具体贸易的史料缺乏，有关清代贸易情况涉及不多。

② 李延辉：《察哈尔经济调查录》，察哈尔之农业，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科出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17页

③ 因史料缺乏，缺少张家口地区粮食交易的具体数据，估计数量很大。

④ 刘驹兵：《多伦诺尔开辟商埠的调查报告》，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⑤ 宋哲元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卷二十三执业编 商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食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各县之间的粮食交易以及农民之间的交易次数很频繁，但交易量不大。

察哈尔地区作为粮食集散市场在西北市场的地位是很高的。

1938年平绥铁路沿线各城市粮食输出额（单位：元）^①

张家口	宣化	大同	怀来	厚和	阳高	平地泉	怀安	丰镇	合计
7、322、 092	6、630、 795	3、847、 196	3、597、 506	3、002、 033	2、 932、 759	2、710、 325	2、233、 367	1、 171、 424	38、094、 927
19%	18%	11%	10%	8%	7%	7%	6%	3%	100%

注：1938年蒙银调查

上表中，张家口粮食输出额占到九个城市的19%，察哈尔区域四个城镇：张家口、宣化、怀来、怀安占到输出额的53%，彰显了察哈尔在西北地区粮食集散地的地位。

1909年，平绥铁路开通，察哈尔的铁路运输业兴起，张家口、多伦诺尔成为天津港口的腹地，同时改变了察哈尔地区粮食贸易的流向。通过火车从张家口、多伦诺尔输出的粮食增多，以供应天津的内需和出口贸易。

平绥铁路物产运输一览表（单位：吨）^②

地名物产	荞麦	莜麦	小米	黄米	豆类	胡麻	菜籽	高粱	玉米	糜子	大米
张家口	1000	10000	100000	1000	10000	10000	10000				
沙岭子							20000	15000			
宣化			10000		4800			5000			
下花园			3000		10000				3000	20000	
新保安			3000		2000			20000			30000
沙城			8000		4000			2000			
康庄			5150	9400							
怀来			5540		310			1770			
总计	1000	10000	134690	10400	31110	10000	30000	43770	3000	20000	30000

上表为1934年平绥铁路局统计的平绥沿线的物产运输情况。铁路经过察哈尔地区张家口、沙岭子、宣化、下花园、新保安、沙城、康庄、怀来。上述各地主要是向北京、天津一

① 今村鸿明：《张家口研究》，见《内陆亚细亚研究》第二辑，蒙古善邻协会，昭和17年（1943年），第81页

② 平绥铁路管理局编辑：《平绥》第1册，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带输送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以莜麦、荞麦、小米、黄米、高粱、糜子、豆类、胡麻、菜籽为主。1934年，粮食输出数量最大的是小米，其次为高粱、豆类、大米、胡麻，共计输出粮食303,570吨。多伦诺尔“杂粮以大麦、小米、高粱、糜黍为大宗，每年至少有产额的三分之一输出平津一带”。^①察哈尔地区与天津等对外商埠的联系加强，成为其商业腹地。

铁路的开通对察哈尔地区商业贸易影响很大。铁路运输速度快，运费低，刺激了商品交易。

中国各种运输方法运价之比较^② 单位:国币(分)

运输方式	运价(每吨公里)	运输方式	运价(每吨公里)
人负	75	人车兽拽	14
骆驼	25	汽车	38、7
骡马驴	25	铁路	8、68
小车人推	19		

上表看出，铁路相比传统的交通运输工具，费用最低。“平绥路局……东运粮食杂货，西运输出国茶，……运费均已特为减低，各商往来即便，路方收入亦增。民十三、十四年，收各一千百余元”。^③可见，铁路运输因其低廉的费用，受到商家的欢迎，火车运输成为首要选择。在增加了铁路局收益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商品输出量的增多。粮食输出就是其中的一项。

铁路的开通，铁路沿线的村镇地位提高，成为粮食商品集散中心。平绥铁路经过的沙岭、宣化、下花园、新保安、沙城、康庄、怀来成为各县商品集散中心，与相邻各地商业往来频繁，商业兴盛。其所集散物品多属农作物，粮食即其一大宗货品。虽然张家口的运销能力会受影响，从察哈尔区域来说，运销能力增强。

2)、粮食交易机构

与粮食交易息息相关就是从事粮食买卖大大小小的粮栈，分布于察哈尔地区各个角落，构成粮食交易的分销、收购商业网点。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粮店分为“干粮店”和“湿粮店”。所谓“干粮店”是一些小粮栈，除买卖原粮外，还替大的粮栈代收粮食。“干粮店”因资金微薄，收粮后一般不付现金，待粮食卖完后再付款，一般是旺季营业，淡季关门。所谓“湿粮店”即规模较大，全年营业，收粮付现款，但价格比干粮店略低，除买卖原粮外，兼营米面加工、金融借贷业务。^④“粮栈专

① 《察哈尔与绥远》，《内蒙古史志》，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2年，第68页

② 洪鲍：《中国各种运输方法运价之比较》，大公报1936年09—30—11

③ 陈庚雅：《西北视察记》，上海申报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第24页

④ 《尚义的商业》，《河北近代经济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从事谷类之买卖，兼作贷借。大都定以秋获时为返还之期，返还是以杂粮，未及返还时则征以相当之利息，收得谷类，见机贩出各市场，乃常例也”。^① 张家口商会 1932 年调查，张家口米粟交易行的商家 46 家。^② 1929 年，多伦诺尔资本在三千元以上的粮店 13 家，县城内资本在 500 元以上粮行 9 家。1933 年，多伦商会由义和粮店的郭英才任委员长，显示了粮店在各业中的地位和权威。^③

洋商介入粮食交易，从张家口等地直接采购粮食，销售于北京、天津或直接输往国外，使察哈尔粮食贸易融入国际市场并受国际贸易环境影响。1929 年，洋商在张家口设庄采买胡麻、菜籽、皮革、绒毛者数十家，张家口每年销售胡麻二百五十余万斤，菜籽约二百余万斤。^④ 总之，在民国时期，察哈尔区域粮食交易是商品交易的重要内容。

民国时期察哈尔地区粮食贸易呈现了时代地区特色。1)交通工具的改善使粮食运输便捷，改变了传统的依靠骡驮马运，因此也部分地改变了交易途径和路线。2)洋行、洋商介入粮食交易，将粮食贸易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粮价受制于国际因素。3)粮食市场仍以内外蒙古为主。国内市场环境的变动，使北京、天津地区占据察哈尔地区一部分粮食市场。

2、牲畜及畜产品交易

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察哈尔地区自明代以来就是蒙汉互市的重要地区。康熙 35 年(1696 年)，废除明朝马市，开辟归化、张家口、多伦诺尔等贸易地点。^⑤ 这些地点主要交易的商品之一就是牲畜。张家口大镜门外的西沟、正沟为牲畜交易市场。专做内外蒙古生意的外馆在清末就有一千四五百家。每年交易额约在一万两千两。至 1916 年，张家口“西沟”“外馆”增至一千六百家，贸易额达一万五千两。(进口八千万两，出口七千万两)进口货物多是鹿耳、驼、羊毛、灰鼠皮、狐皮、羔皮、紫羔皮、肚羔皮、香牛皮、沙狐皮等。据张多关统计，在 1932 年下半年，张家口进口外蒙的货物总计达十六万五千八百一十一元。^⑥ 多伦诺尔自有清以来，为内外蒙古与中原沟通的孔道，“饶有牛、马、羊、驼等牲畜。皮毛以兴多伦，与内地出产之绸缎、布锦、茶叶、珠饰、杂货行实物交换”。^⑦

牲畜贸易的繁荣，在税收上的反映是税收的增多。“查多伦税收向以皮毛、牲畜为大宗”，

① 《蒙古之商业》，《商业之状况》，第 4 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② 路联速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

③ 《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64 页

④ 《中国民国省区全志—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第二编察哈尔特别区区域志，商业，民国十八年（1929 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⑤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 年，第 17 页

⑥ 杜庚尧：《张库通商》，第一篇商务，天津大公报社代印 民二十二年五月（1933 年）第 9 页

⑦ 杨溥：《口北六县调查记》，第五章多伦县，民国二十三年（1934 年），第 23 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①从乾隆 20 年（1755 年），朝廷每年征收牲畜正税一千一百两，而至光绪 19 年前（1893 年），多伦诺尔征收牲畜税不下一万六千两银子。^② 每年征收的税款成为国家财政收入之一。

因牲畜交易频繁，交易量大，牲畜市场有以下要求：一是有宽阔地带以便畜养未成交易活畜，二是在牲畜交易市场开有便利的中介买卖机构，及为牲畜交易商提供饮食住宿的方便条件。张家口的马市设在大镜门外半里的地方，多伦马市也几经变更，从行人拥挤的马市街移入二道北街，因其地仍狭窄，又转移至东西寺庙前的广场。^③ 张北的马市街因其开阔地带，水草丰美而兴盛起来。

牲畜交易多由中介人沟通买卖双方，很少有买主与卖主直接发生买卖行为，这些中介人称为牙纪。买卖成交后，牙纪可得到 2% 的佣金。

牲畜市场上一年四季都有交易，冬春为淡季，夏秋为旺季。最兴旺的是每年 6 月至 10 月。张家口马桥“每年由六月六日起至九月十日止，每晨卖马牛羊者麇集于此桥，有不远千里而来者。”^④ 张北县旺季以农历六月二十四的骡马大会为标志，六月二十四为正会，会期六天。整个会期以牲畜贸易为内容，会期结束，出入款总额约十万余元，颇盛一时。到 10 月份，牲畜交易逐渐减少，牲畜交易进入淡季。^⑤

牲畜交易的发达，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一般牲畜交易市场是城镇的商业中心之一，如张家口大镜门外之西沟、正沟，张北县的北大街。与此同时，带动了旅馆业、饮食业、交通业、金融业的发展。民国初年，张北县城有旅店业百余家，到 1938 年发展到四百余家。

牲畜交易的活跃是其高利润决定的。由于蒙古地区交通不便，蒙古族对使用价值的重视，商人的送货上门的经营形式很受蒙古族欢迎，史载：“以布易牛其利最巨，每布一匹，值银约一两二钱，易犍一头，初不将去，仍留原主教养，比三四年，牛已长大，然后驱入内地可售价八九十元”^⑥中间利润是相当大的。而且，越往草原深处，牲畜价格越低。多伦诺尔牲畜价格要比库伦高出四分之一，比恰克图和乌里雅苏台更贵了。^⑦商人充分利用这种条件，通过赊销、放高利贷等手段聚敛钱财，资本迅速积累，经营规模扩大。具有一定经营规模的商人形成了在一定区域内的垄断贸易，利润更加可观。

皮毛交易，以羊皮、羊毛为重点。羊皮、羊毛集散地主要为张家口、多伦诺尔。内外蒙古皮毛汇集后，除由国内工厂及察哈尔各县手工业作坊订购外，即由洋行收买，运往天津，

① 姜振青：《多伦县政概要》，多伦县公署总务科文书股，康德二年（1935 年）

②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 年，第 19 页

③ 姜振青：《多伦县政概要》，市场概况，多伦县公署总务科文书股，康德二年（1935 年）

④ 《中华民国省区全志》，第二编察哈尔特别区域志，张家口街市之概况，民国十八年（1929 年）

⑤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

⑥ 东方杂志社编：《蒙古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局，民国十四年（1925 年）

⑦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七章多伦诺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43 页

输出海外。开始羊皮、羊毛在牲畜市场并非重点。至 1870 年开放内陆市场以后才逐渐兴起。尤其是天津开埠以来，张家口成为其次级市场。天津洋行，将商业势力拓展至察哈尔区，大量收购内外蒙古各地皮毛，刺激了察哈尔地区皮毛业的兴起。“英国商人于清光绪二十年，派买办至张家口收买羊毛，嗣后逐年扩张其势力，以侵入内蒙腹地，已由独石口一带地方，渐及多伦诺尔方面矣。”^① 1929 年，洋商在张家口设庄采买皮毛，张家口每年销售羊毛、羊绒、驼绒约为三百七十余万斤，皮革约二十九万余张。^② 光绪 30 年（1904 年），在多伦诺尔先后开设了庆昌和（英国）、美丰（美国）、德成（美国）、新大兴（德国）、三井（日本）、怡和（日本）等六家洋行。^③ 1912 年，这六家购买量约为 50 余万斤，与 1913 年购买量大抵相当。现将 1913 年，六家洋行购买量列表以明洋商购买状况。^④

多伦诺尔洋商采买货物表

行名	羊毛	羊绒	骆驼	羊皮	牛皮	马皮	獭皮
和平	64123斤	924斤	42248斤	张			
美丰	72154	1618	8272				
福山	83610	7852	6721				
庆昌和	96960	7898	5631				
立兴	95636	8578	9617				
康立				3623	612	1050	34
合计	418453	26570	72489	3623	612	1050	34

注：原始资料中骆驼一项，骆驼数量很高，从其购买量上推知应该为驼毛或驼绒。

从表中看出，洋商购买多集中于羊毛、羊绒和驼毛（绒），皮张收购量较少，这主要是受国际市场需求影响，对羊、驼毛的需求量上涨。

洋行除自行收购羊、驼皮毛外，商业利润刺激了察哈尔各皮毛行、牙纪行帮助洋行收买货品。皮毛行及牙纪渐为洋商购买皮毛的采办点。洋行一般与察哈尔各大皮毛行预约一年的买卖，根据商品数量及价格预付保证金，或确定可靠牙纪等购买，只需付定钱即可。^⑤ 皮毛行或牙纪可享受外国免旧关通过税的待遇，而欣然替洋行采买。

洋行介入皮毛市场，察哈尔皮毛市场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因而在价格、需求

① 《蒙古之商业》，外国商人，第 5 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② 《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第二编察哈尔特别区区域志，商业，民国十八年（1929 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③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 年，第 22 页

④ 《多伦诺尔开辟商埠的调查报告》，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4 页

⑤ 《蒙古之商业》，商贾，第 5 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量上受国际市场环境的影响。宣化县是察哈尔地区皮毛交易一个集散地。1936年，因洋商急需皮张，“老羊皮每张售价一元七八，全涨至三元，山羊皮亦由一元三四，增至二元，杂皮二元或一元五不等，几被兜售一空，均系运津，转往外洋，各皮庄有货无多，大有供不应求之势。”^① 察哈尔皮毛价格，在市场上时有波动。一般是张家口看天津，天津看上海，同时津沪又看海外，国外的皮毛价格遇有波动，很快就会影响到察哈尔地区。

日益繁兴的皮毛市场，促进了察哈尔手工业和民族工业的兴起和发展。加工业围绕皮毛业展开。内外蒙古以及俄国输入的畜产品，多为初级产品或半成品。这些初级产品或半成品在张家口等地要进行加工，促成了察哈尔地区以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手工业的兴起。具体划分为：裘皮业、粗皮业、白皮业、生皮业、毛毡业、靴鞋业、鞍鞞、马尾业等。^② 各手工业作坊多分布于生产力较发达的口内外各县，分布广、数量多。张家口商会1932年调查，张家口有裘皮业188家，皮革业57家，生皮贩56家，粗皮行65家，皮靴业30家，共396家，占47行2018家的五分之一。^③ 多伦县1929年皮毛加工作坊60余家。^④ 产品主要是日常生活、生活所需。张北县“皮作坊四五十家，产品种类繁多，有老羊皮袄裤、狐狼皮袄裤、椅垫、裹肚等。县城内还有十数家皮绳铺，专门用牛马熟皮制成皮绳、皮鞞、笼头、马嚼子等类，系为车马之用。”察哈尔生产的皮毛产品虽制作粗糙，因质量好，实用性强受到内外蒙古以及全国人民的喜爱。

20世纪20年代，中蒙贸易中断，察哈尔地区的牲畜交易大受影响，严重影响着察哈尔地区经济的发展，各项事业均呈现衰败之象。可见带有高利润的垄断的牲畜交易市场，在其实现高利润，并促进经济大发展时，一旦垄断被切断，市场顿呈萎缩。在遇到西方更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和制度时，更显现了察哈尔区域经济发展的缺陷：在经济大发展时，没能更好的整合市场资源，改进生产技术，提高管理水平，制定更有效的、更适合市场发展的制度，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做上述工作确有困难，但为后来该地区经济发展起到警示的作用。

3、日用百货交易

日用百货指所有的日常生活所需货品。察哈尔地区：口内、口外及锡盟蒙旗，生活环境和习俗不同，人们日常生活所需也有所差异。针对蒙古牧民，商品的种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① 《边疆半月刊》，《边事汇录》，第一卷第4期，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②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户籍志 商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③ 路联逸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④ 《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表格整理

一是销售量较大的砖茶、烟草、烧酒、棉布、绸缎、布匹、小麦粉、杂谷，二是销售量较小的铜、铁器具、佛像、马靴、白糖、炒米、糕点等。口内外货品大致为：南货、北货、洋货。北货如棉布、烟酒、干果、铁器、蓝靛等类，南货如茶糖、颜料、药材、丝绸、海味，洋货如火油、火柴、洋布、褡裢、洋皂等类。^①

日用百货品种繁多，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这些商品大都是全国各地的手工业产品。察哈尔地区对外开埠后，洋货的比例越来越高，不仅渗透到口内外各县，蒙旗也成为洋货的销售范围。

地理环境的差异，日用百货类商品的庞杂，决定了在各县与蒙旗的营销方式的不同，以适应地区差异。口内外各县因人口相对密集，村落相对稳定，一般通过设置固定的销售网点，实现日用百货类商品的流通。店铺分为三类：杂货铺、广货铺和洋货铺。杂货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商铺间资本差异大。资本雄厚的杂货铺除零售外，还兼营批发业务。经营品种以油盐、酱、醋、米、面、茶糖、及布匹、点心、菜蔬、山货为主。^②张北县除县城有二十余家杂货店外，连同各区乡有百余家，比其它类型的商铺数量多。广货铺，主要经营京广杂货：鞋帽、首饰及儿童玩物，化妆品等。一般在县城或繁华城镇设有店铺，乡村一般很少。随着后来风气奢侈，京广铺的营业也变得很发达。^③洋货铺主要经营呢绒、标布、麻织品、洋油、洋蜡，次为较为奢侈的化妆品。^④洋货铺多设于县城和城镇上，乡村很少。1929年多伦县城内资本在三千元以上的洋货铺有2家，乡村没有分布。^⑤

杂货铺、广货铺、洋货铺的商品大都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商业中心购买。张北县德福成广货店的东家就时常住张家口，一为摸行情，二为采购货物。^⑥也有的从邻近各县购买所需物品，再转售本县及他县。如“赤城县多从宣化、怀来、康庄、沙城等地购买纸烟、火柴等货品，再行销于本县及沽源、宝昌、多伦。一部分从北京、天津直接购货。”^⑦张家口资本雄厚的洋货店、杂货店多从京、津、沪购货。与北京、天津、上海等商家是批发与零售的关系。杂货铺、广货铺、洋货铺还向专门售卖各种商品的商号订货，如向各大茶庄、绸缎庄、煤油庄、皮鞋铺、毡帽铺等订购货品，补充货种。

锡林郭勒盟蒙旗人口较少，牧民居住分散。在锡林郭勒盟行销日用百货主要以行商的形式进行。一类为张家口、多伦及其它城镇的坐商商号，每年按季派出帐房，分销货物。一类

① 《多伦诺尔开辟商埠的调查报告》，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3页

②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户籍志，商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表格整理

⑥ 《民国年间的张北广货铺》，《河北近代经济史料》，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7页

⑦ 宋哲元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卷二十三执业编 商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为在城镇设有商铺，仅向固定商铺赊购商品的商人。

日用百货交易最主要的是货源。在张家口、多伦有商铺的行商的货品都是商铺来供应，商铺一般通过在当地经营他种商品的坐商或手工业作坊，或是在货源地委派采购人员采买货品，也有直接向前来推销商品的商家采买。行商对蒙旗的商品庞杂，经营品种无明确分工，即为“吃、喝、穿、用”一揽子经营，有“上至绸缎、下至葱蒜”之说。拥有雄厚资金的大商号才能垫付如此多的资金，因而形成了大商号垄断日用百货，从中赚取丰厚的利润。

各行商之间都有各自的活动范围，有“各吃各路”之说。张家口行商在锡盟地区主要活动范围为东西苏尼特旗。光绪二十六年（1892年），张家口最富有的几家零售店不仅在城里有买卖，而且和蒙古人进行交易。……在锡盟进行贸易的有大亨玉、天太德、复兴隆，其范围在苏尼特右旗和苏尼特左旗。^① 1933年，多伦行商在锡盟北部十旗情况见下表^②

乌珠穆沁旗	德隆泉、四盛昌、凝远合、兴隆瑞、世兴永、义永魁
乌珠穆沁贝勒府	庆盛德、裕合永、天合泉、复合永、德义恒、义兴魁
东豪沁旗	万盛魁、聚义和、义兴魁
西豪沁旗	恒裕荣、义兴魁。
贝子庙	复兴振、永兴源、义兴魁
阿巴嘎王府	凝远和、玉盛长、恒裕荣、复兴魁、义兴魁
阿巴嘎贝勒旗	义和长、义兴魁
阿巴嘎札萨克旗	同盛兴、义兴魁、兴明魁
东苏尼特札萨克旗	德盛魁、兴明魁、裕和永、义兴魁
西苏尼特札萨克旗	裕和永、复兴振、大成裕、义兴魁

除行商外，多伦诺尔会盟后，坐商陆续进入锡盟蒙旗，在各旗王府所在地或庙宇的附近建起固定的房屋或搭起毡帐，销售货物。坐商在蒙旗内的业务，一般批零兼售，对行商“供垫”、“赊销”；对牧民零售。牧民生活用品除行商上门交换外，牧民会主动到邻近市场交换“以一己之所有或一族有，欲将卖者，纠合为一团，到邻近城镇进行大宗交换”^③

大商号一般有自己专属骆驼队或牛车，专门服务于商家的运输业也很发达。张家口的驮运非常发达。从张家口到锡林郭勒盟路途遥远，多由骆驼运输。张家口的黑达子沟、白家沟、东驼号、西驼号、范家大门以及西关街，有养驼业 100 多家。^④

①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十章张家口，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714页

② 《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3页

③ 《蒙古之商业》，贸易状态及习惯，第6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④ 《张家口的骆驼队》，《张家口文史资料》第21辑，张家口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92年

多伦牛车最多时达万辆以上，一般商户有十几辆牛车为平常，拥有上百辆的不在少数。1933年，多伦有旅蒙商250户，大商号有10家，每户有牛车百辆以上。大商号除牛车外，另有几队骆驼队也很平常。1933年，多伦有骆驼一千多峰。^①拉骆驼人有两句话“八沟、热河、喇嘛庙”，“西口到东口，再到喇嘛庙”是两条最繁忙的驮运路线。汽车通车，商家也会选择汽车运输，不乏驼队和牛车队与汽车相伴草原。

商号与牧民交易一般是以物易物，很少有现金交易。“一只羊只换一块砖茶，一头牛换一尺布”，交易极其不平等。在牧民偿付不了货款时，商号会以借贷或赊账方式交易，并计其利息。商家不但赚取了一般买卖货品的利润，更赚得难以数计的赊借利息，利润比日用百货交易更多。商家除了提高日用百货价格，降低牲畜价格时，还会在牧民家畜养未成熟之牛、马、羊，此中间所得利润也是商家高利润一部分。

随着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对外开放，越来越多的洋商参与日用百货交易。1926年，驻天津英商“平和洋行”的活动沿沈阳、天山、林东路线向锡林郭勒盟东北部的东西乌珠穆沁旗、东西浩特旗、贝子庙一带渗透；驻天津俄商“瓦利洋行”在林西设立专门经营锡林郭勒盟北部蒙旗的商号有：天崇元、庆德正、裕兴栈等商号。^②以瓦利洋行为例。瓦利洋行向东乌珠穆沁输入的商品主要为布匹、麦粉、砂糖、茶叶、烟草、果子、五金等，涵盖了牧民日常生活所需。瓦利洋行将洮南的百货输入东乌珠穆沁旗，换取畜产品，再将畜产品运至洮南。一年内输入东乌珠穆沁旗的商品价值18900元。在这一过程中，瓦利洋行赚取了很大的利润。

洮南与东乌珠穆沁旗商品价值比率。^③

地区	洮南价格	东乌珠穆沁价格	比率
输入杂货合计	18900元	34020元	1: 1.8
输入畜产品合计	64125元	51300元	1: 0.8

从表中可看出瓦利洋行从东北洮南购买的商品，是以近2倍的价格售于东乌珠穆沁。而畜产品价格则低于洮南价格近一倍。瓦利洋行从中赚取将近三倍的利润，商业利润驱使洋商经营此业乐此不疲。

综上所述，察哈尔地区日用百货交易，具有以下特色：1)货品种类繁多，产销地域广。2)因日用百货贸易，使察哈尔区域不同经济区域来往密切，除商业往来外，加强了不同地域文化的沟通。商人需学习蒙古语言，掌握各地货币兑换比率，了解国际、国内商业行情。3)日用百货业被大商号所垄断，各分号及行商是大商号在基层乡村旗县的分销人员。4)日用百货

① 卓孔铭：《多伦县志》，运输沿革，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年，第264页

② 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第六章外商和伪蒙疆商业，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第72页

③ 第五调查班《东乌珠穆沁旗地方调查报告书》，《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第74页

的商业利润大。

(二)、察哈尔地区贸易系统与市场结构

近代开埠以后，一些口岸城市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工商业相对发达的优势，逐渐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对周边腹地发挥较强的辐射能力。华北经济区域的核心城市是天津。20世纪20年代，天津腹地包括了河北、山西、宁夏、青海、甘肃和蒙古全部，以及山东、河南、陕西、新疆和东三省的部分地区，总面积达200多万平方公里。^① 察哈尔地区面积为207500平方公里，占华北经济区域面积的十分之一。察哈尔地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贸易系统，可分为若干较小的、有若干层次的经济区。

1、察哈尔地区区域贸易系统

察哈尔区域贸易系统的划分是以地理为界线，以区域内大宗商品和工商业经济发展程度为基础的。察哈尔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较小经济贸易区市场往来密切，出现了以大宗商品贸易为中心的各级城镇和城市。

民国时期，随着历代商业发展的积淀，察哈尔区域形成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口内十县南部经济贸易区，以多伦诺尔为中心的口北六县及察哈尔十二旗群中部经济贸易区，以及以贝子庙为中心的锡盟各部经济贸易区。现将各经济贸易区略加介绍。

(1)、三大经济贸易区

南部经济贸易区

该贸易区为原属直隶省的十县，开发较早，是传统的农业经济区。主要城市有张家口，城镇为各县县城：万全、宣化、蔚县、赤城、龙关、怀来、延庆、阳原、怀安、涿鹿，以及因铁路修建或地理位置优越而兴起的城镇：柴沟堡、沙城等。张家口作为往来内外蒙古之孔道，交通运输网络业已形成，尤其在平绥铁路通车后，“举凡内外蒙古以及绥远、包头各地货物，悉皆云集于张家口，然后再循铁路，输至平津出口”^② 张家口通过各交通网络，向北与内外蒙古相连，向东沟通平津各大城市，成为察哈尔地区的商品集散中心。南部经济区所属万全、宣化、怀来等县皆为产粮及各种经济产品如葡萄等产区，是商品集散市场。

中部经济贸易区

位于蒙古高原的中部经济贸易区，海拔比南部高出1000多米，为大陆性气候。民国时期，此区属于半农半牧经济结构。主要城镇有多伦，张北，商都，康保，宝昌，沽源及未开垦察

① 赵津：《中国近代经济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② 李延燾：《察哈尔经济调查录》，第一章察哈尔之沿革，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科出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哈尔左、右翼八旗王府所在。此经济贸易区为张家口通内外蒙古必经之区，这一地区属于中转地。除一些商品自用外，皆在此区集散后，向南转运至张家口、赤峰等地，向北转运至内外蒙古。多伦诺尔从清代就为商业城镇，商业经验丰富。该地为此区的中心城镇，各种粮食、杂货、牲畜、洋货皆在此集散。该区域相对南部经济区，陆路交通方便，但区内城镇集市少。人口少，居住分散，集市一般都为常集，即每日有集。“盖因村庄辽远，来往无常，随时贸易，不受约束，以期便利”^①

北部经济贸易区

此经济贸易区属于高原地带，气候较中部更为恶劣。此区包括锡林郭勒盟五部十旗，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为主。该区地处草原地带，日常大宗商品即牲畜及其畜产品，除此之外，该区东乌珠穆沁旗境内盛产盐碱，也成为该区经济收入来源。

该区地处察哈尔区域北部边缘地带，人烟稀少，居住分散，没有固定居所，因此贸易所覆区域较南部、中部较大，通过长途贩运才可以到达贸易目的地。因此，该区域中心城镇贝子庙直至进入1915年才渐有定居商人。贝子庙成为该区域单一商品的输出地和各种外来货的输入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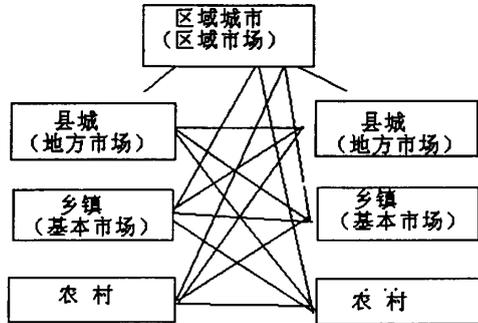
(2)、各级市场网络结构

上文从整体上将察哈尔区域分为三个经济贸易区，而察哈尔区域内部大小不一、层次不同的商品流通层次构成了察哈尔区域内的市场网络结构。商品流通层次一方面联系着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另一方面各层次之间也发生着复杂的纵横向流通联系，从而使察哈尔区域形成了有体系的、互通的，以城镇为中心的经济空间网络结构。

察哈尔市场网络结构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最基本的层次，即农村或牧区，是各级市场的奠基石，农村或牧区广大的基础性资源及对日常生活用品的需要，是各级市场交换的基础；第二层次即为基本市场，即农村或牧区产品的初级集散点，一般距村、牧区居民点较近的乡村或苏木，在市场体系结构中，分布广泛，覆盖面大，几乎囊括了乡村和牧民居住点，但商业贸易点的数量少，布局分散，商品流通量也较少；第三层次为地区市场，这类市场多为商业性的城镇，贸易点分布量超过第二层次，具有配套的流通机构，商业性城镇是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重要环节，是两者经济流通的重要保障；第四层次是区域城市，数量比前两层次减少，区域城市一方面联系着本地区的县城、乡镇和广大农牧区及各旗王府，另一方面沟通更高层次市场。张家口属于察哈尔区域的区域城市。张家口较其它市场层别有更繁密的商业贸易点，有规模的流通机构，贸易辐射区大。

^①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将察哈尔区域划分为四大层级市场，在实际的市场流通中，层级更加复杂。例如各县城、乡镇会成为另一个区域市场流通领域的市场层级，参与到另一个区域市场的商品流通中。察哈尔区域的阳原县因地近山西，与山西邻县商业来往频繁，阳原县的粮食输往大同，成为大同市场的一个层级。下图为察哈尔区域贸易系统下的市场层级图。



2、察哈尔地区各经济贸易区市场结构体系

为了能更清晰的了解察哈尔区域内部市场结构的构成和商品流通的方式，下文将以各经济贸易区为单位，考察各经济贸易区体系下各级市场结构与商品的流通情况。根据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特勒提出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按一定的规律相互结合，构成城市等级结构体系，即一个大城市统辖一定数量的中等城市 and 更多数量的小城市，大城市的服务（或职能）和影响通过中小城市逐级传输到整个地区。因此，在考察各级市场的构成以及商品流通功能的发挥时，侧重从各级城市（镇）的市场功能论述。^①

察哈尔地区各经济贸易区的联系是通过陆路交通工具联系起来，除了山路、沙漠交通不便之外，运输畅通。陆路交通运输路线的形成构成了各经济区之间的联系。从图中（附录一）看出：经济贸易区从南向北依次扩大。张家口是南部经济区的中心，也是整个察哈尔地区的中心。以张家口为中心有三条主要的通商路线。一条为张库商道，是最主要的商道。张家口辐射的各路驿站，即旧张库商道，这条商道在新张库商道开辟后很少有商队。新张库商道：张家口—张北—四里崩—滂江—乌得—库伦，这条路是汽车路。第二条商路，是从张家口出发，经张北、商都、丰镇至绥远的西北路，可延伸至新疆、乌里雅苏台等地。第三条商路：从张家口至多伦汽车路，这条路连接了南部与北部经济贸易区。以多伦为起点的库多大道、多伦至克鲁伦大道连接了北部经济贸易区，将南北中三区联为一体。

①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出版社，2001年，第221页

在区域贸易系统之下，有若干层次的市场系统。现分别讨论各经济贸易区内城镇对下层市场的辐射功能，以明了区域市场的构成。

(1) 张家口为中心的南部经济贸易区

A 南部经济区贸易系统的大概区域（附录二）

B 经济区域内地方市场与基本市场的关系，标注有各乡镇的图标（附录三）

C 乡镇与市集的关系，以怀安县为例（附录四）

从以上逐级降低的经济结构中，大致可以了解南部经济区的贸易系统状况。南部经济贸易区除了繁华和富足程度不同外，同内地农业区一样。较中部经济贸易区人口密度大，单位面积内村镇多，各村镇之间联系紧密。各乡村构成的基层经济系统是上一层或更高级经济系统的基础。各乡镇的市集一般都位于各乡镇的边缘，同时与两个或更多的乡镇发生贸易关系，使系统内部互相交叉，紧密联系，形成了经济区的商业网络。

(2)、以多伦诺尔为中心的中部经济贸易区

多伦诺尔为察哈尔经济区域系统内的二级层次结构，在经济流通中处于商品流通的中转和集散地的位置。因所处地理位置及环境的不同，形成了与南部不同的经济层级结构，呈线状辐射的商业网络布局的特点。

多伦诺尔市场辐射图（附录五）

从图中看出，多伦将分散于周围的乡镇、王府纳入其辐射范围，贸易路线长，涵盖区域大。在此经济贸易区，包含了人口相对集中的农村乡镇，居住分散的蒙旗王府。经济贸易区内以农村集市及牧区为基础市场。另外，多伦城市系统不仅对其经济区内产生吸引力，也与经济区外的城市、城镇及乡镇发生经济上的关系，构成区域外贸易系统的一个市场层次。

(3)、以贝子庙为中心的北部经济贸易区

贝子庙市场贸易图（附录六）

从图中看出，北部经济贸易区在整个区域系统中的贸易状况，主要通过各商道与中、南部及区域外之邻近城镇的进行贸易，路线简单。商品流动跨度大，地域广阔，流通时间也较长。贝子庙及周围各旗府所在地，通常是商品集散中心。各旗府及所属各村分布呈点状分布，密度大，单位面积内贸易点数量少，一般是各牧民分布点向旗府所在地集中，再聚集到较大的旗府贝子庙，与南部、中部进行商品流通。贸易期限较短，除了各旗府的庙会、那达慕等集中性集期外，多是通过少数的媒介者即商人流动，沟通各旗县之间的经济往来。

3、察哈尔地区各级市场结构具体分析

各级市场和城市类型的具体分析将有助于了解察哈尔区域经济的特色和结构。因此选取农村集市、农村及牧区庙会，典型商业性城镇多伦诺尔、集散性区域城市张家口进行具体分析。

(1)、集市、庙会的作用与功能

南部、中部经济贸易区集市与庙会

所谓集市，即为定期交易为核心的，以土特产品交易为集散地的商品流通机构。集市的经济作用在于向其经济贸易区提供商品与劳务，是构成经济贸易区商品流通网络的基本要件，是商品流通网络中最基本的环节。

集市在沟通各地经济，尤其是农村各地经济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给农民之间，以及农民与商贩之间，提供了交易的地点，是商品流通的初级市场。在农村集市中，集市是土特产品的集散地及上一级市场商品的分销地。“凡属农家日常生活必需品均能购到，不过杂货多自外来。”^①可见，集市将农家土特产品通过高一级市场销售出去，又将高一级市场中的商品分销给农民。

察哈尔区域内各地农村集市有不少是专门性的集市或集市内划分专门区域，售卖某种商品，为生产者和购买者提供了便利。张家口元宝山集市就是专门的皮毛市场，距离大境门外二公里处，扼南部经济区与北部经济区之要道，从中、北经济区转运而来的皮毛均在此集散，为销售、购买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皮毛市场的交易额相当之大，全区域之经济命脉几乎系于此集市区。^②怀安县的柴沟堡集市是粮食尤其是杂粮的集散地，“该地粮店林立，面行栉比，亦足证其繁盛之一端”。^③怀安县东塔村“市上以毛驴为最多”^④是买卖毛驴的市场。在张北县城内，粮店、马店最多“马市设于北门外，粮店设在西北街一带”^⑤集市的功能分区，便利了购销双方。专业性集市是建立在察哈尔区域自然经济基础上，是适应农民经济生活的需要的，但是专门性的集市并不排斥其他商品的交换。

察哈尔区域内集市和全国都一样，一般都有固定的集期，俗称之为“赶集”。从贸易周期看，以旬三集为主，一月共计九集。万全县县城集市在南门外，逢三、六、九交易。^⑥怀安县治城每于三、六、九日为集期。集期的安排一般都是错开的。怀安县治城每于三、六、九日为集期、左卫镇以二、五、八日为集期、太平庄以一、四、七日为集期、东塔村则以五、

①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二政治志（一）户口，风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②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③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二政治志（一）户口，风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④ 同上

⑤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⑥ 路联遼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九民俗，集市庙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十两日为集期。^①从怀安县所属集市看，每个相邻集市的集期是错开的，怀安县几乎天天都有集市，可以给交易者充分的周转余地，提高交易频率，方便交易达成。但这一原则并不是绝对化。怀安县与邻近的万全县县城的集期相同。施坚雅认为决定集期最重要的不是避免相邻集市的冲突，而是不和上层市集的集期冲突，相邻市场集期相同是常见的。

中部经济贸易区集市不同于南部经济贸易区，集市定为常市。中部经济贸易区因“村庄辽远，来往无常，随时贸易，不受拘束，以期便利”^②中部经济区因地近蒙古草原，除本县及乡村农民来市交易外，蒙民也就近在此区集市交易，因此，集市上商品除粮食土特产品外，还有牲畜等畜产品。张北县工会村集市交易的大宗产品为粮食、皮毛，商业也因此而日渐兴盛。可见，多元的商品市场更能促进集市的兴旺和维持集市的知名度。

除定期集市外，察哈尔区域内还有数量不等的庙会。庙会在察哈尔区域内分布较广，南部、中部、北部经济区均有庙会，也是商品集散的主要初级市场。但农民对庙会与牧民对庙会的依赖性不同，农民除庙会外，可通过各种集市参与商品买卖，而牧民对庙会的依赖性很强。因北部经济区庙会与南部、中部经济区庙会的不同，先来讨论南部、中部经济贸易区庙会情况。

南部、中部经济贸易区庙会统计表

县 别	庙会名称	日期（农历）	天数	备注
怀 安 县	城隍庙会	5月26至6月朔	10天	交易额 3至10万元
	柴沟堡庙会	6月6日		
	天梁桥庙会	3月27日		农具小孩玩具
	馒头山庙会	4月28日	三天	
张 北 县	骡马大会	6月24日	六天	牲畜买卖 10万余元
	泰山庙酬龙神	4月28日	四天或六天	万余元
阳 原 县	西关泰山庙	四月中旬至下旬		售百货
	北观真武庙	九月上旬至中旬		骡马交易
	揣骨疃龙神庙	七月下旬		售百货
	东城关帝庙	六月中旬		售百货

①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二政治志（一）户口，风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②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张 家 口	赐儿山	4月8日		
	营城子	4月18日	一天	
	奶奶庙	4月28日	一天	

根据《怀安县志》《张北县志》《万全县志》《阳原县志》整理

从上表中看出：庙会是一种特殊的集市，它的开设时间与定期集市不同。在持续时间上，庙会少则一天，多则十天半个月。庙会持续时间长，交易量大，交易范围广阔，相邻各省、各县商人也都前来赶会。“天津、北平、张家口商人来此（张北县）售货者亦不在少数”。^① 在开设时间上，庙会一般集中在农历的三月、四月、六月、七月、九月。是农耕前、农忙后及秋收后的季节，农民借庙会购置些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庙会商品以日用百货或生产、生活用品居多，其中尤以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的交易为主。张北县六月庙会时，“将届秋令收获禾稼，一切农具购买困难，借此会期，内地商贩运来出售，远近农民均来争购”除此之外，“各乡农民所畜牛、马、猪、羊、鸡蛋等项均可出售”^② 在察哈尔区域内牲畜买卖非常普遍。张北县六月二十四日的庙会就命名为骡马大会。庙会的规模要大于定期集市。张北县骡马大会六天庙会的交易金额达到10万元，怀安县的城隍庙会交易量也在10万元之多。庙会频率小于集市，庙会开市的季节性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定期集市的不足。怀安县人民因“交通不便，平时物价昂贵，购置不易，普通须待斯会（城隍庙会）购买终岁必备之物品也。”^③ 庙会与定期集市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察哈尔区域的初级商品流通市场。

从另一个方面说，集市和庙会是一个重要的社交场合和消遣娱乐场合。“一则借作临时市场购买一切应用器具，二则各亲友应办事务可借此晤面解决一切如议婚、相看新郎之类。”^④ 除此之外，在交通不便的乡村或牧区，庙会期间“各乡农民外该、该外债务结帐还债……大多数规定会期，彼等接头清结一切”有益于财务整理。^⑤ 相对闭塞的农民和牧民通过参与商品交易，接触了外面的世界：物价的涨幅、当地的新闻、政界的形势、婚丧嫁娶等信息。庙会上各种演出、戏法，是农民乐于参与的娱乐项目。

北部经济贸易区庙会

对于北部经济区的牧民来说，定期集市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北部经济贸易区初级市场的商品流通主要通过各喇嘛庙的定期庙会实现的。北部经济贸易区喇嘛教兴盛，寺庙林立。各寺庙成为分散居住牧民进行商品交换的场所，是牧民与外部经济联系的枢纽。据不完全统计，

①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② 同上

③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二政治志（一）户口，风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④ 陈维淹修，许闻诗纂：《张北县志》，卷五礼俗志，集市与庙会，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⑤ 同上

北部经济贸易区所属五部至少有 60 座大小不同的寺庙，其中被清朝赐名的有 20 多座。^①

相对于分散的牧民点，各大大小小的寺庙本身就是一个很庞大的消费群体。贝子庙在兴盛时期，有喇嘛一千二百人，平均一年内消耗的物资：小米五万石、砖茶五千块、白面五万斤、莜面五千五百斤、黄油五千斤、白油一万斤、灯油一万斤、火柴三万盒、果子一万斤、葱一万斤、粉条五千斤等，苏尼特左旗锡林查干敖每年需用米面三万余斤，如此大的消费，大部分是用寺庙财产与商人交易而来。^②庙会经济机能的发挥，首先在于寺庙本身的吸引力。寺庙本身拥有的财产是他们进行商品交换的基础。苏尼特左旗锡林查干敖包庙，光绪 13 年（1887 年），寺庙财产有牲畜 14186 头，该庙在 1958 年庙存现金 130 万元。据 1944 年对贝子庙庙产的调查，寺庙财产有马 1611 匹，牛 1449 头，驼 82 峰，羊 10469 只，年收入现金 96538 元，收入牲畜 4214 头（合银元 263100 元），年支出 363000 元。乌珠穆沁达布苏庙、哈拉嘎庙、王子庙、那音淖庙牲畜达三万头，全旗寺庙牲畜占牲畜总数的三分之一，阿巴嘎旗杨都庙有大畜一万头，小畜五万余只。^③因资料有限，不能统计出各个寺庙不同时期的资产情况，但从清中叶及民国末期的庙产调查，我们可以推及寺庙拥有资产应该相对比较稳定，因而保证了商品交易的进行。拥有如此集中雄厚的物质资源的各大寺庙，对商品媒介者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纷纷以寺庙为中心，建立商业经营网点。

宗教信仰的风靡，使分散的牧民点向寺庙聚集。每年各寺庙大大小小的法会是他们集会的日期。多伦诺尔的汇宗寺和善因寺，每年举行大的法会有三次：正月初六到初八，六月十一到十五，七月初七到十八。贝子庙的主要法会有：正月祈愿会、二月祈愿会、吐义姆奇图会、秋季祈愿会等。在法会后要进行以娱乐为内容的赛马、摔跤、射箭比赛以及以物资交流为主的商品交易活动。牧民以当地土特产交换所缺物资：用羊皮、羊绒、牛皮、驼绒、狼皮、狐狸皮、交换小米、面粉、普通棉布、丝绸、蒙靴、马鞍具、银铜制品、砖茶、糖、月饼、佛具等。

北部经济贸易区的庙会是牧民精神信仰的归宿，更是他们日常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市场。通过庙会这一窗口，打开了蒙汉交流的渠道。庙会的经济、精神、文化的多元聚集效应，使各层次市场媒介在寺庙周围扎根，担任起沟通与上一层市场的责任。如常住锡林查干敖包周围的达赖商号、那松商号、巴音桑商号等，常住杨都庙的乌兰岱、达赖、苏梨子、帽子阿尤希、朝克图商号。为了加强与牧民的沟通，商号的名字用蒙语翻译，体现了地域特色。而流动于各居民点的小商人遇有庙会也前来贸易。

① 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第四章记述整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年

② 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第四章记述整理，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年

③ 同上

北部经济贸易区相对集中活动场所还有各种不同级别的祭祀敖包集会和那达慕大会。这两种集会一般也有相对固定的日期和相对固定的地点，但相对庙会，规模较小，主要以祭祀和娱乐为主，商品交换的规模也就较小，是庙会交易的一种补充和调剂。

(2)、商业性城市（镇）

“因商而兴”是中国传统城（镇）的基本发展模式。转运贸易的兴起是张家口城市和多伦诺尔城镇兴起的重要因素。察哈尔区域内的商业性城市（镇）较其他发达区域，城市（镇）商业发展不足，城市（镇）规模较小，商业性城市（镇）数量少。从商品的流通种类、流通量及货源上看，更多的是大小不一的乡镇集市。在第一章相关章节中已经论述过张家口、多伦作为商业性集散地的作用和功能，这里只作简单的补充性说明。

商业城市——张家口是具有多功能的高级市场。张家口城市在历史长河中经历了几次城市功能的转变。从军事地位较高的军镇到商业城市，到成为察哈尔省省会，张家口成为集商品集散中心和转运中心为一体的商业城市。张家口商业城市地位在察哈尔区域是首屈一指的是因其具有作为商品贸易中心的地理的、社会的、经济的有利条件，并且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城市本身具有了多种贸易条件：贸易设施完备、贸易系统健全从而巩固了其作为商业都市的地位，并继续对其腹地发挥经济吸引力。通过商品流通，更多的将不同地域文化、思想观念以及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潜移默化的传达到察哈尔区域的每个角落，在整个区域中扮演文化交流的角色。

商业城镇多伦诺尔对其辐射区域内的商品具有集散功能。多伦诺尔吸引力范围内的农民生产者、手工业者和牧民生产者都可以通过已经形成的贸易途径，实现其产品的商品价值。在民国初年，多伦诺尔的皮毛交易额达三千万两白银；牧民运销至多伦诺尔的青盐达十余车（每车约 500 斤）；一次大的庙会每天从经棚、林西、赤峰一带运进粮食就达二百多车。多伦商业性城镇有“日进千车”（青盐和粮食、皮毛），“日出万头”（牲畜）“日进斗金”、“日出斗银”之说。^① 这些产品通过多伦诺尔集散市场，实现了产品的商品价值，改善了生产者的生活状况。商业城镇的地位不是一成不变的。19 世纪后半期，“有很多从广东来的货品，如白酒、麻油、烟草等，以及过去从东南部蒙古必须经过多伦诺尔才运到蒙古去的粮食，现在都已不再经过这里，而直接由毕鲁浩特（经棚）运往喀尔喀去了；另一方面，巴林旗和阿鲁科尔沁旗的蒙古人及东北部的其他蒙古人也都不再把牲畜赶到多伦诺尔卖，而是也赶到毕鲁浩特去，卖给那些现已住满了克什克腾旗的汉人”^② 20 世纪初，由于内地、内外蒙古、俄罗

① 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第三十二章多伦县，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 年，第 354 页

②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七章多伦诺尔，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344 页

斯商道的转移，察哈尔区域集散市场改变，多伦诺尔商业城镇因之衰落。

三、商业主体、组织的近代化

城市近代化除了地理位置、社会环境、交通运输等因素影响外，商业的推动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商业推动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中，商业本身内部结构的近代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推进城市近代化的基本动力，反映了城市近代化是各个方面综合的近代化。商业的主体商人、商人组织的近代化，进一步强化和推进了城市近代化的进程。

(一)、商业活动的主体—商号与商人

察哈尔区域经济发展与变迁，城市的贸易地位的提升，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它与清朝政府相对稳定大环境，近代以来新型交通、通讯设备的改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察哈尔地区商品流通领域有关。此外，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及其组织，更是商业发展的内部动力和源泉。活跃的商业活动，商人组织的机构运作及机能，商人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中担当的角色，可以窥见边疆地区商业特色及社会经济发展内涵。

1、商号个案研究

察哈尔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主体，多是具有一定资金、人员及经营管理体制的组织机构—商号。其商业贸易网络广泛、商业经营具有垄断性，因而对察哈尔地区经济发展影响颇深，对此类大商号的个案分析，可明了察哈尔地区商业的勃起与兴衰，是研究城市贸易不可忽视的环节。因察哈尔地区历经动荡，战火纷扰，加之文化教育落后，有关这些大商号的记载留下不多，仅有一些只言片语及商号商人的回忆录，笔者试着从这些留下的记载中寻觅商号发展轨迹，以明了察哈尔地区经济发展的面貌。另外察哈尔地区商号的发展与当时绥远的商号有其共同点，有关方面也可作一映证。

(1)、多伦诺尔商号聚兴长的兴起

聚兴长商号是在咸丰末年开业的，在1926年改为恒聚昌商号。聚兴长商号的发展史代表了察哈尔地区众多商号从小本经营发展的过程。聚兴长是集股做买卖的，由姓艾和姓常的，

每人出资十两银子作股本，另一个人以身股加入。起初三人是赊购货物，以出草地的形式，将货物运到草原，以三倍的利润售于牧民，并换取草原上的畜产品，再将畜产品转卖多伦诺尔，可获取二倍的利润。多伦诺尔地近草原，一个月可往返两三次。经过不到二十几年的时间，在光绪十七年（1891年），聚兴长就有资本八百多两，职工二十几名，牛车几十辆，初具发展规模。随着资金的积累、人员的增多、交通运输工具的完善，与牧民的信任关系的建立，聚兴长的商业发展日新月异。并继续沿用赊购的方法，从北京、天津、张家口等地进货，用一千两赊购七八千甚至一万两的货物。因与牧民建立的信任关系，牧民先期把牲畜和皮毛交与其代售，在资金较少的情况下，加速了商品的流通，这种赊购、代售等经营方式是小本商号能够兴起一个原因。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聚兴长在多伦诺尔城内设有三个店铺，经营方式也由最初的下草地，改为专做牧民登门买卖和小商号、手工作坊匠人的赊货业务，营业额相当可观，每日登门买货的牧民的营业额就达五千多两银子。此时聚兴长商号职工发展到五十多人。1926年，聚兴长的资金达八十万两，红利股二十几股，每个股可分到七千多两银子。^① 聚兴长从咸丰末年到1926年，6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资本从原有的二十多两扩张到八十万两，增加了近三万倍，如此快速的资本积累现象，是很难用经济学原理解释的。聚兴长的发展是一部分较小商号兴起的典型。绥远地区大盛魁的兴起、发展，较聚兴长则更具典型性，其经营范围几乎无所不包，涉及商业、牧业、手工业、金融业、交通运输等行业，商业网络遍及内外蒙古、俄国、华北天津、北京，长江流域武汉及海外各国。

聚兴长、大盛魁等商号的兴起说明，商号虽从小本生意做起，却能积累雄厚的资本。主要原因是商号利用了农牧业经济的差异及牧业经济的闭塞性。处于农业区与牧业区交汇地带，拥有不同背景文化是这些商号资本从无到有积累的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商号种种不平等交换方式，也是其资本积累的重要原因。同时聚兴长等商号顺应市场环境，采取多种经营手段，赚取高额利润。如在下草地前准备礼品，馈赠王公贵族和蒙民，与蒙古买主搞好关系，建立长远合作的信用关系，了解其嗜好，投其所好。这些经营手段，在今看来还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大多数商号将货物赊销给牧民，牧民支付利息，商号从中赚取本金和利息，属高利贷性质的业务。这往往是商号的一项大收入。牧民财产主要为牲畜，支付多以牲畜为主。多伦著名商号德隆泉就曾占有乌珠穆沁百分之七八十的牲畜，牧民也成为其牧工。^② 商号通过高利贷业务，不仅赢得了高额的利润，还将经营范围渗入牧业生产之中。不仅商业资本在扩大，

① 《多伦旅蒙商》，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4页

② 《多伦旅蒙商》，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

牧业资本也在扩大。这种对牧业的投资，使商号不仅赚取了农牧产品交换的直接利润，还赚取了间接利润。拥有牧业资源的商号投入开发如抓绒、皮张加工等行业。工商牧兼营，获得连锁经营的效益，这种经营方式在察哈尔地区相当普遍。

资本雄厚的商号将商业资本转到金融资本与中介业务方面。开设钱庄或货栈。在多伦有大来店、聚元店（牲畜）、大合店（粮店）、大一店（茶庄）等。^①钱庄多经营存放款以及对当地的往来过账，栈店业务丰富，以“买卖之周旋、委托贩卖、委托收买、货物担保之金融、货物搬运周旋及保险、货物搭卸及包装、兑换及汇兑、货物之保管、税捐之代纳及手续、买卖顾客之宿膳”为业务。^②商号经营涉及金融流通领域，承担金融机构的职能，说明了商号商业机能的扩张。商号涉入金融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金融制度的不完善和低级发展程度。商号经营货栈业务，将商品流通的产、购、销连为一体，实现了商品流通的紧密配合，从而提高了投资的回报率。这是察哈尔地区商号经营的一大特色。

察哈尔地区商号的营业网络广泛，在1921年以前，商号营销网络东可达北京、天津，经多伦至东三省，西至绥远、包头、宁夏、甘肃、新疆，南至上海、武汉，北可达内蒙古各旗，外蒙古库伦并延伸至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等处。商号营销网络广泛，动因在于商业利润。茶叶、绸缎等日用百货是商号经营的大宗产品。大商号或在原产地设立分号，专门采买货物，或派出采购人员至天津、北京等地采购货品。茶庄派采办人员将南方茶叶运至天津，再由天津至通州，由通州利用骆驼或骡马运送至张家口，再通过设在库伦等地分庄销售茶叶。可见其营销网络之广泛，这也是边区察哈尔商业贸易的一大特色。

综上所述，察哈尔地区商号大量兴起，与其背后的高利润有关。商号的兴起及其蓬勃发展，相应的带动城市（镇）商业功能的完善。

2、商业组成人员及组织制度

商业发展的基础是基层的商号，商号的顺利运作和畅通服务得益于组成该商号的员工，及一套有效的约束和规范其员工行为的组织和管理制度。一般商号内部人员可分为学徒、掌柜、财东，外部人员有牧场工作的牧民，手工作坊的工人及运输队员工。

在对人员的经营管理上，各商号具体制度有所区别，但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1)、职责分工明确

财东为商号出资者，是商号的董事。一般不干涉商号事务。只在分红时，领取红利及听

① 《多伦诺尔城》，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5页

② 《蒙古之商业》，商业之状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取掌柜报告业务情况，对重大问题作出指示。对掌柜有监督责任。

掌柜是商号中权力最大者，是财东经济政策的执行人，相当于现在经理的地位，统筹规划，运筹帷幄。主要掌管商号的全盘事务，管理主要的生产经营活动。掌柜掌握门市或工厂的业务，具有领房子、下草地，到外地采购货物的从业能力。掌柜又分为等级及职责分工不同的掌柜，一般都是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学徒又称为伙计，刚入商号时，无工资，各商号只负责其洗澡、理发、毛巾、肥皂、茶水等。学徒在店内的工作即“三把壶”，即伺候掌柜的茶壶、酒壶、夜壶，并负责扫地、生炉子、搬运整理货物。在商号内的学徒，除日常打杂以外，学习经营是最主要任务。学徒要学习商品的蒙古名字，熟悉商品价格，学习招待顾客的礼节等等。去牧区的学徒学习的内容还包括：蒙古语、蒙古民族习俗、蒙古生意经营、经营路线等。

(2)、规章制度严格

各商号用人时，只雇用从学徒升为正式的员工，不用外来人员，以防泄密。与掌柜意见不合，有偷盗行为、不正当行为等要被开除。对全体员工要求“脚稳、嘴稳、手稳”。不许多吃多占，不许私自做买卖，不许偷东西，不许逛妓院、不许长支短欠等。商号对从业人员严格要求，塑造了从业人员较高的职业道德和素质，为商号的商业活动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优厚的工资福利及提升

商号的工资及福利，同手工业作坊相对，要优厚的多。学徒在商号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内，可被提升为“同事”即正式员工。在学徒的三年至五年中，头一年给工资十元左右，以后会增至二十元至三十元不等，升为“同事”后，工资二十四元至六七十元不等。掌柜的均吃股利。福利待遇各商号不同。一般年终时会分发礼物，如毯子、衣料等。三年大帐时，可根据营业状况分得红利；学徒在满师后可回家探亲等。商号优厚的工资和福利是吸引众多的家贫或有志于从商的年轻人进入此行业，并通过学习锻炼成长为可以独立经营商号的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阶层的上升性流动，改变了城镇、乡村的人口布局，众多的商业从业者构成了城镇人口的一部分，推进了城镇近代化的进程。

3、商号与洋商

随着近代沿海与内陆的开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势力从沿海向内地渗透。处于内陆的察哈尔地区受此影响。西方资本主义商家或派代理人或设代理店，收买蒙古特产，并竞相销售本国机制产品，极大的影响了察哈尔地区的商业贸易格局。

与察哈尔地区商业关系密切，对其有影响的，首先是来自俄国贸易势力的入侵。从十九

世纪中叶始，俄国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咸丰八年（1858年）的《天津条约》、《陆路通商章程》，光绪六年（1880年）《中俄伊犁条约》等条约，获取了：俄国商人在各蒙旗贩卖土货运往天津可免纳子口税；俄国由恰克图、尼布楚、科布多、归化、张家口输往天津的俄国货物，可减税三分之一。这些免税特权及贸易范围的扩大，使俄商在内外蒙古比传统的贸易占有优势。俄国挤占了察哈尔地区商号的一部分市场。据俄国税关所调查，自乾隆40年至道光30年一百年间俄国税收情况，俄国对中国的贸易额持续上涨，特别是在各条约签订后，贸易额增长十几倍。^①

1921年，外蒙古宣布独立，外蒙古政治、经济势力全为俄国所掌握，彻底改变了察哈尔地区商号对外蒙的贸易格局。外蒙政府对华商施以种种重税，所有债务关系一律解除，使察哈尔地区各大商号损失惨重，在外蒙古俄商势力日增。外蒙留三音诺颜汗部，据说从前汉商很多，现在（1927年）留的不过原来的三分之二，约三十余家，俄商现增至十余家。^② 因俄的政治势力，“俄商在库伦设立商务股份公司，贩运俄德货物，用租税上之差别待遇，以侵夺市场”

汉俄商务在外蒙商业势力对比。^③

年份	1924年	1925年	1926年
中国	85, 7%	78, 3%	68, 7%
俄国	14, 3%	21, 7%	31, 3%

受政治势力保护的俄商开始占据了外蒙古市场，虽中国商业在数量上仍占相当的比例，但从各项记载中，商业的营业规模在下降。

1929年，外蒙政府关闭与中国的所有通道，察哈尔地区商号几乎全部倒闭，张家口商务受很大打击。“汉方势力，仅及二连，张垣商务亦一落千丈，大镜门外各外馆受库伦分号全军覆没之影响，以至停业，百不存一。”^④ 察哈尔地区各商号的兴起至衰落，说明稳定的国内环境是商号兴起的大背景，民国年间，政治的动荡，国内、国际环境的改变，是察哈尔地区商号衰落的原因。

对察哈尔地区商号影响较次的为英、法、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天津的开埠，内地的开放。察哈尔地区成为天津的商业腹地，在天津等地设有总店的英、法、美、日商人渐次将势力扩张至察哈尔地区及外蒙古，洋行在张家口、多伦商业中心设立分店，收购畜产品并倾

① 《蒙古志》，沈云龙编《中国边疆丛书》第二辑，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495页

② 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大陆印书馆，民国二十一年，第100页

③ 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大陆印书馆，民国二十一年，第102页

④ 杜庚尧：《张库通商》，第一篇张库通商之回顾与前瞻，天津大公报社，民二十二年五月（1933年），第9页

销洋货。20世纪30年代，张家口的洋行有：德华洋行、美孚石油公司、美国华北洋行、德国梅华洋行、英美烟草公司、亚细亚石油。^① 张家口洋行的销售网络几乎遍及察哈尔地区，各种洋货在察哈尔地区流通。

20世纪30年代察哈尔地区洋货销售情况。^②

类别	纺织类	煤油类	食品类	用品类	化妆品类	总计
销售额(元)	2948700	904590	286796	85225	138311	4363622

洋行在察哈尔地区销售的洋货中，纺织品的销量最大，占67%以上。其次为煤油，食品，化妆品及日常用品。

多伦的六家洋行：庆昌和（英国）、美丰（美国）、德成（美国）、三井（日本）、怡和（日本）、新太兴（日本），几乎垄断了多伦的绒毛、细皮市场。^③ 洋商采用开始高价收购皮毛，垄断市场后又压低价格的策略，将皮毛市场纳入其商业势力之下。洋商依赖便利的通讯工具，市场信息灵通，价格灵活控制商品价格。各商号在市场运作上受制于洋商，失去了对洋商的竞争力，多转变为替洋商收购皮毛，分销洋货的代理人。察哈尔地区商号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具有市场优势，一旦遇到资金更雄厚、市场运作灵活、信息更为畅通的西方商业势力，显得捉襟见肘。

（二）、商业组织的近代转型与社会整合

察哈尔地区三个经济贸易区，经济发展结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在各时期也不同。活跃在三个经济区的商业组织，主要为汉族商人组成的各行业组织，在不同历史上时期，其名称、功能、组织也都有所不同。商业组织近代化是商业发展推动下的一个必然趋势。尽管与开放较早的沿海口岸比较，商业组织的近代化速度、程度、规模呈现了缓慢、程度低、规模小等特点，察哈尔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低，直至进入民国时期还没出现大规模的工业，多为前店后厂形式的手工业作坊式工厂，亦工亦商。本文所考虑的商业组织，包括了手工业组织，以比较真实客观地反映察哈尔地区商业组织的变迁过程。

^① 《察哈尔省资源调查张家口班报告》，《满铁调查报告》第二辑，黑龙江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7页

^② 李延焯：《察哈尔经济调查录》，察哈尔之工业，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科出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第103页表格整理

^③ 《多伦旅蒙商》，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9页，原文为七家，有误。

1、商业组织的近代转型

(1)、清朝商业组织概况

从事于长途贩运贸易的山西、河北商人，在察哈尔地区商业活动频繁。商人在路途遥远，商业活动不便的情况下，旅居异地的同乡人成立具有联谊乡谊，兼营善举性质的商业组织成为必然。商人纷纷集资兴建了以地缘为纽带的同乡会馆、公所。聚集在张家口从事商业贸易的外籍商人，在张家口设立的会馆有：堡子里鼓楼后街祁县会馆、榆次会馆，东关街太谷会馆，上堡市圈汾阳会馆、孝义会馆。这些会馆的社首均由商人轮流担任，有专管、有制度、有铺产、有收入，可以救济同乡，介绍柜伙，通过这样的组织联系，山西商人在张家口的经济地位进一步巩固起来。^① 康熙五十五年（1761年），旅居多伦诺尔的直隶（河北）籍商人集资兴建了直隶会馆（又称三官庙），乾隆十年（1745年）山西籍商人集资兴建了山西会馆。在多伦从事小本经营的伊斯兰牛羊行商人，于嘉庆三年（1798年）集资修建了清真北寺，光绪元年（1875年），抓毛行回民商人捐资兴建了清真南寺。^② 商人热衷修建会馆和清真寺，是长途贩运贸易的反映，是行商活跃程度的反映，也是行商数量达到相当规模的反映。同时会馆和清真寺的修建，也体现了各商人团体狭隘的地域观念，因此会产生矛盾。山西籍、河北籍商人在商业竞争中矛盾重重，为了争得在地方商业上的绝对优势，发生过争夺商公所的领导权的地位之争，反映了商人组织的地方狭隘性。^③

察哈尔地区的商人大部分为出身于山西、河北地区的外籍移民，本地区商人实力微弱。这些移民商人，在察哈尔地区组成了各行各业的同业组织——“行”、“社”。“行”、“社”在维护本行业商业利益的同时，发挥着政府主导的社会结构中所不能发挥的作用。同业组织与察哈尔地区的社会系统的关系，将决定这些商人的社会地位，商业机能的发挥。察哈尔区域的三个经济贸易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同业组织的发展程度表现不同。受政治因素影响，同业组织的组织形式及社会功能的发挥也有所不同。

进入张家口社会系统的移民商人，与本地基层社会系统相互融合，成为本地基层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本地基层社会是由“社首”构成领导阶层，沟通、联络官方与民间关系的基层社会系统。各个商业组织是在“社首”领导下的，从事商业各项活动，发挥同业组织慈善、宗教、公共事业等社会功能，实现自我管理的基层民间社会组织。清朝时期，张家口商业组织为：朝阳村保正行、市圈保正行、南门外保长行、下堡商业集团组织。^④ 朝阳村保正行所

① 左宝：《山西银号钱庄在张家口》，《文史月刊》，2005年，第10期

②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年，第17页

③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年，第24页

④ 今堀诚二：《中国封建社会的构造》[日]，日本学术振兴会刊，1978年，以下未标注均引自此书。

属商业组织主要是从事旅蒙商业的商业组织。除了旅蒙商业，还有生皮业、牲畜牙行及从事金融业的票商。因重修关帝庙，光绪三年（1877年），石铺、木铺、泥匠、铁铺等行业组织活跃。这些商业组织都在保正行的控制管理之下。市圈保正行所属商业组织主要是从事恰克图贸易的商人的商业组织。有汾阳社、汾孝社以及票行等行业组织。南门外保长行所属商业组织为金龙社（后改称马王社、牲畜牙行）、牛王社、牲畜社（羊庄、马庄、牛庄）。下堡商业集团组织所属十三行是张家口最初的行业组织。十三行分别为钱行、当行、增盛社（茶行）、布行、油行、杂货行、京果蜡行，梅葛社（染行）、碱行、面行、缸行、麻行、清水行。随着张家口商业的发展，行业组织相应改变，十三行转变为：钱行、当行、杂货行、布行、茶行、生皮行、细皮行、粗皮行、黑白皮行、面行、米粟行、缸行、油行。上述十三行中，金融业有2行，经销日用百货业有3行，畜产品加工业有4行，粮食加工业有3行，粮食买卖有1行。这是张家口早期商业组织的部分情况。

随着商业经济发展，业务分工也越来越细，行业组织分化。牲畜社分化为羊庄、马庄、牛庄；皮毛加工业分化为皮行、老皮行、细皮行、黑皮行、白皮行等。而且出现了工人行业组织，在同一行业中，经营者和生产者属于不同的行业组织。如义和社为皮鞋匠人的行业组织。

商业经济自身的发展是近代商业组织转型的直接动力。清末时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中国社会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向近代经济转型。商业经济渗入了更多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表现为各种新式商业形式的出现及为洋商直接或间接服务的传统行业在增多。在张家口，五金、西药、照相、钟表、镶牙、汽车运输等新兴行业不断形成。这些新兴行业的兴起，丰富了察哈尔地区商业的内容，因其从诞生受资本主义经济影响，行业本身带有近代色彩。英国、美国、德国洋行设分号于张家口、多伦等地，依赖察哈尔地区商人和商人运作成熟的营销渠道，收购土产，销售洋货。洋商及其代表的先进的商业运作机能进入察哈尔地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商业的分布，呈现传统与先进的对比，并不断地撞击着传统商业，使传统商业直接或间接进入了洋行的收购活动中，尤其是绒毛的收购。察哈尔地区出现了多家皮毛庄，如多伦在1929年时，毛店就有10家。^①1935年，张家口旅蒙商皮毛业公会有47家之多。^②

清朝政策引导也是商业组织近代转型的动力之一。尤其对于察哈尔内陆偏远区域来说，受资本主义经济冲击较小，察哈尔地区商业经济内部发展缓慢，引起的商业组织的转型较慢，

① 《多伦事情》，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9页表格整理

② 路联遼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不能适应强烈的市场经济的变化。因此，近代察哈尔地区商业组织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的结果。

1901年，清政府在清末新政中提出了设立商部，并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26条。在章程中规定了商会组织及办事程序，商会职责，入会程序等。^①清政府力行推动下，察哈尔地区各城镇创办商会，各商业组织也加入其中。张家口在光绪32年（1906年）成立商会，名张家口商务总会，后改名为张家口总商会。^②多伦于光绪30年（1904年），设立商公所，管理商务。^③除两地以外，其他小城镇均没有设立商会。商会的成立，克服了以地缘性质的会馆、公所商业组织的狭隘性，是一地全体商人的共同组织，各商业行会组织加入商会完全是自愿，只要交纳一定的会费即可入会成为会员。商会的宗旨是为了维护商人利益，振兴商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2)、民国时期商业组织

进入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都致力于同业组织以及商会的立法和执行，将大多数商家吸纳到同业公会之下，同业公会组织取代了旧式的行会组织，实现了行会组织向新型行业组织的转型。

1918年，北洋政府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及《工商同业公会规则实施办法》，饬令各省筹建同业公会，规定了设立公会的原则及一般程序性规定，并对旧式同业组织提出了处理办法。而《施行办法》对规则作了补充说明外，加强了规则的可操作性。^④南京政府于1929年颁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1930年1月公布了《工商同业公会法实施细则》，这两次立法更强化了同业加入公会的强制性，并规范了同业公会的组织结构，强调以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组织的统一名称，并在法律施行一年内完成改组。

察哈尔地区中心城市张家口各旧式行业组织奉令改组公会，根据工商同业公会法及施行细则，各同业组织依法登记，并于1932年改组。现将张家口行会组织改组后的情况，列表说明。^⑤

张家口商业组织概况表（各同业工会简称为某业）

名称	皮裘业	饼面业	煤炭业	面业	肉业	鞋帽业	绸布业	皮革业	生皮业
数量	188家	112家	111家	104家	78家	77家	75家	57家	56家
名称	木作业	粗皮业	京果业	缝纫业	车马业	叫卖业	五金业	盐业	茶业

① 陈争平：《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工商社团的社会整合作用》，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06年，第4期

② 路联遼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六自治 民众团体 县商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③ 卓孔铭：《多伦县志》，大事记，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年

④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72页

⑤ 路联遼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张家口概况 商业，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数量	73家	65家	47家	50家	39家	29家	30家	18家	16家
名称	染业	转运业	首饰业	席麻业	饭馆业	米粟业	杂货业	皮靴业	铁铺业
数量	15家	32家	23家	21家	23家	39家	8家	30家	14家
名称	马尾业	铜铺业	糖业	钱业	油酒业	豆腐业	旅栈业	汽车业	澡堂业
数量	8家	11家	8家	12家	39家	23家	35家	56家	9家
名称	干鲜果业		牲畜交易业		米粟交易业		中西药房业		旅蒙皮毛业
数量	53家		49家		46家		67家		38家
名称	黑白瓷器业		纸烟煤油业		书纸笔墨业		醋酱鱼菜业		照相镶牙钟表业
数量	8家		14家		30家		24家		30家

对原无组织的各商业组织，也统一名称，成立同业公会，如五金同业公会、铜铺同业工会、缝纫同业公会、首饰同业工会等。

同业公会权威的确立，使其很容易就推广至各乡镇。延庆县县城有酒业、布业、粮业、毛业、麻业、棉业、杂货业、土货业、药业等十二同业公会 140 家。所属的永宁镇有布业、粮业、香碾业、杂货业、山货业、药业、油业、面业等十二同业公会 150 家。^①彻底摆脱了旧的行业组织。

察哈尔地区行业组织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基本上在 1932 年完成了各城镇、乡村的改组工作。从上述行业的改组途径看出，大多数同业公会是从旧有的行业中转化而来的。如张家口茶叶公会，皮裘业公会、绸布业公会，也有一部分同业公会如五金同业公会、照相同业公会、汽同业公会是随新兴行业兴起而出现的同业公会。

相对于单一行业的同业公会组织，跨行业的商人团体—商会非常活跃，尤其是进入民国以来，在政府力量的推动下，商会已经普及至各乡镇。

1915 年，北京政府颁布《商会法》，这部法律中明确了商会的法人地位，对商会会员资格进行了认定。1929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商会法》规定：商会的设立必须有 5 家以上的工商同业公会发起，若无工商同业公会，则必须有 50 家以上的商业法人或商家发起。《商会法》颁布后，察哈尔地区商会兴起。^②

怀安县商会根据《商会法》规定，于 1916 年成立，其所属乡镇柴沟堡也于 1916 年成立镇商会。^③ 万全县商会在 1929 年成立，所属镇洗马林于 1932 年，成立镇商会。^④ 多伦县商公

① 宋哲元等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卷二十三执业编 商业,民国二十四年(1935)

② 彭南生:《行会制度的近代命运》,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0页

③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六政治志 自治 商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④ 路联遯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六自治 民众团体 县商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

所于 1916 年改组为商会。截止 1933 年前，察哈尔地区所属各乡镇已经普及商会。

商会的成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时代的进步性，其进步性在于它是各同业公会的团体，是资产阶级的商业组织。其进步性表现如下。

首先，从商会活动机制上看，商会更加注重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在选举方式上、议事制度、经费收支方面，商会都有较为健全的组织机构，商会在北京政府时期，采用会长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改为委员制。其共同点是各司其职、各尽其职。在会长制度下，“先由各商会选出会董，复由各会董推定会董”。^①在委员制下，下设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主席、常务委员，分属不同的职责。主席综理会务。各级不同的商会，组织人员也会不同。各组织人员均由选举产生，体现了民主原则。其程序为“会员大会票选执行委员 15 人，监察委员 7 人，并由执行委员互选 5 人为常务委员，再由常务委员互选一人为主席”。^②不论在何种制度下，会员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各委员都在会员大会上产生。“凡属会务必经委员决议后执行”，体现了商会的民主原则。

其次，从章程内容看，商会会费的等级制度，体现了公平的原则。怀安县商会将会员分十个等级，根据缴纳会费的多少进行划分。^③另一方面，商会更多的是代表经济实力较强的会员的意向。分级分担会费则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各会员经济实力的不同。虽没有找到相关史料证明：会费多少与选举权力是否相互联系。但可以推测实力较强的会员在商会中的地位，及商会维护其利益方面的能动作用。会员在履行义务时，也会得到对等的权力。

再次，从组织构成看，商会会员多为同业公会组织，个人单独入会者很少。同业公会的近代转型，同业公会组织进入商会是自愿等，使商会的组织结构具有的近代气息。

商会和同业公会从性质上讲都属于民间自治性组织。在组织上不存在隶属关系，商会是不同行业的团体，同业公会是同行业的团体。但二者相互依存、关系紧密。特别对于察哈尔边疆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同业公会实力相对较弱，对政府依赖性较强。代表政府意向的商会与同业公会相比，有更强的组织力和权威性。因此，在讨论商业组织的社会整合作用时，是以商会为中心。

2、商业组织的社会整合

(1)、调解经济纠纷

商事纠纷在商业活动中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在 19 世纪时，商事纠纷仍由地方官府处理。

①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二政治志 自治 商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② 路联遼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六自治 民众团体 县商会 张家口商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③ 景佐纲修,张镜渊纂:《怀安县志》,卷二政治志 自治 商会 怀安县商会,民国二十三年(1934)

清政府在1904年颁布《商会简明章程》饬令全国设立商会，并赋予商会调解商事纠纷的权力。民国政府又通过多项法律给与补充。察哈尔各级商会享有此等权力。

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各行业竞争激励，加之市场波动性很大，使不少资金薄弱的小商号、商人受到排挤，以至破产。因此处理债务纠纷成为商会的一项主要工作。商会有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多伦商会处理债务纠纷分为两个步骤：一为候教。即在债务人还不起债的情况下，由商会作调解人，债务人和债主达成协议的过程。商会为债务人说情，希望债主同意分期偿还或延期偿还。二为监督拨还。即在做了候教工作后，根据债主的态度，决定偿还方式。拨还即债主同意债务人分期偿还债务。如不同意拨还，既由商会监督宣告债务人破产，标卖债务人的全部产业还债。^①因商事纠纷越来越多，一般商事纠纷先经同业公会处理，难以解决的纠纷才经商会仲裁。而经商会仲裁需交纳一定数额的仲裁费用。

商会调解经济纠纷，执行商事仲裁，保护了商业主体的合法权益，消除当事人之间的冲突，保证经济秩序的稳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除此之外，商会对劳资纠纷、行业纠纷等纠纷的调解、仲裁功能，使商会成为商业主体信赖的组织。

（2）、沟通政府与商人的纽带

商会及同业组织处于政府与商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是连接政府与商人的纽带。一方面，商会及同业组织协助政府推进经济政令，为政府提供各行业的商业信息，另一方面，在与政府沟通中维护商人利益。

察哈尔地区商会在统计贸易交易额、物价、产量、商人人口数等商情调查上发挥作用。张家口商会为察哈尔地区总商会，不仅调查了本市的商情，还包括整个察哈尔地区的商情调查。多伦县商会致力于本县商情调查，分别统计了1925年、1926年，输出、输入货种，输出、输入额等。除商情调查外，各商会还协助政府征收税捐。1935年，万全县内政费分摊到张家口的商捐，就由商会向各同业公会征收。^②商会向政府提供商业信息，政府更决策的适用性，替政府征收税捐等事务，体现了商会执行政府政令的职能。

商会为了维护整个市场稳定，促进市场交易活动的顺利进行，就有关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前提是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1916年，中交两行停兑风潮后，张家口钱业公会为弥补当时现银不足，市面经济流通不畅的局面，互相担保，发行铜元。作为国家通行货币—银币的补充。票面价值有十枚、二十枚、一百枚三种。^③铜元流通市面后，缓解了货币紧缺的危机，使市场交易走向正规。“多伦县也因缺乏现洋，由商会指定殷实商号数家，保证发行纸币十余万元，

① 《多伦旅蒙商》，任月海编《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9页

② 路联逢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八政治 赋税，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③ 察哈尔都统署编：《察哈尔政务辑要》，财政，民国八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名为“商票”，市面流通，信用甚佳，可作汇兑，亦此县一特例也。”^①商会及同业公会通过多种活动维护商人的利益，稳定市场秩序是其在与政府沟通中得以实现的。

(3)、参与政治活动及公益活动

察哈尔地区商会参与政治活动很多，如接应来往军队、提供军款、粮草等军需品等。最典型的事例是自设保商团。民国时期，土匪猖獗，扰乱社会正常秩序，尤其是长城以北广大地区，政府执政能力很难遍及每个角落，由商会发起的保商团在维护当地社会治安，保证行旅安全方面起到了政府军队所不能起到的作用。

察哈尔地区各县都有保商团，名称为某县保商团。在各县商团中，多伦县的保商团最具典型性。多伦县保商团，是旧卫署炮手改组的马勇改编的，并将当地保卫团改为商团的马队。保商团有独立的组织机构，多伦保商团设总队长1人，下属三个支队，各支队设支队长1人，每一支队兵50名，共150名。另有步团80名。其职责为保护来往于张家口及内蒙各地商旅的安全。其费用由商会来负担。^②商会在组织保商团后，对抵抗土匪的侵扰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保商团曾两次击灭来县城围攻的土匪。1921年，多伦的警察局长由商会委任，可见在军政势力难以控制地方局面时，由当地具有经济实力的商会担任了维持社会秩序的重任，彰显了商会及其同业组织在政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

商会及同业组织在赈灾活动中，募捐善款，帮助灾民恢复家园，参与到赈灾的实际工作中。1924年7月，张家口市发生水灾，情形严重，“桥东大街附近河坝商民房屋货物完全被水冲没者，约百余户，商民死亡不知下落者，约计三千以下，加以上下游被水各村堡随波逐流以去者，不可胜数矣。”水灾发生后，官绅商各界商议提出急赈办法。在急赈团体的七个团体中，一个为皮行救济会。^③

1928年成立的赈灾委员会，赈灾委员会中有张家口商会主席岳增祥。商会或同业公会在各县蒙旗台站承担放赈工作。张家口纸烟煤油同业公会的文牍马玉衡担任怀来县的放赈委员，蔚县商会委员张杰担任阳原县放赈委员，张家口商会文牍张砚田担任张北县放赈委员，张家口商会书记员担任宝昌放赈委员。^④可见商会或同业公会与其他社团合作，在公益事业中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① 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赋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33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② 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多伦政治现状，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第28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③ 路联逵修，任守恭纂：《万全县志》，卷十二大事记，张家口民十三水灾情形及善后办法记略，民国二十三年（1934）

④ 宋哲元等修，梁建章纂：《察哈尔省通志》，大事记卷下，察哈尔省赈灾纪略，民国二十四年（1935）

结 语

察哈尔地区地处边塞，地理位置独特，依托得天独厚地理位置，察哈尔地区独具地域特色的商业经济繁荣。商业的发展既表现为与内地商业发展相似的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商业发展是以本地区的土特产品以及民众日常生活所需为根本，体现了地域性的特点。在国内国际环境相对稳定的社会背景下，商业贸易体现了广泛性，垄断性，高利润等特征。在商业发展的同时，促进边疆城市（镇）的兴起与发展。尽管本文所讲三个城市（镇）的兴起各有特点，发展路径不同。但在城市（镇）发展中，商业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促进了城市（镇）功能的完善。而城市功能的完善为商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保障系统，扩展了商业发展空间。

察哈尔边疆地区商业发展的内部动力是活跃在该地区的来自以晋冀为主的商人。地域的封闭性、落后性促成商号迅速拓展，形成了对市场的垄断。商号根据察哈尔地区市场环境，制定的营销策略，效果显著。

西方资本主义先进的经济形态带着政治性的侵略进入察哈尔地区后，察哈尔地区的商业发展受到很大的影响，本地区商人垄断商业贸易的格局被打破，不自觉的卷入国际国内市场。在近代化的趋势的推动下，地处边区的察哈尔逐渐开始了近代化的进程。尽管这个过程是缓慢的，落后于同时代内地的，但也迈出了近代脚步。察哈尔地区近代化的程度表现在各地方也是不一致的，城市要快于乡村，乡村快于牧区。而广大的农牧区几乎是停滞不前的。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地区。昔日有过的辉煌已经烟消云散。察哈尔地区经济得以发展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变。察哈尔城市（镇）没有往日的光芒。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托自身的优势资源促进地方的可持续发展，依靠近代工业，发展特色产业，加强经济文化的交流，是现在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应该考虑的问题。

参考文献

档案史料

- [1] 姚锡光：《筹蒙刍议》，光绪三十四年（1908），中国边疆丛书第一辑文海出版社，1965年
- [2] 《中华民国省区全志—京直绥察热五省区志》，民国十八年（1929年）
- [3] 杨溥：《察哈尔口北六县调查记》，据京城印书局初版本抄，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 [4] 李延燾：《察哈尔经济调查录》，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科出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 [5] 贺杨灵：《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 [6] 察哈尔都统署：《察哈尔政务辑要》，民国八年（1919年）
- [7] 杜庚尧：《张库通商》，天津大公报社代印，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
- [8] 刘驹兵：《多伦诺尔开辟商埠调查报告》 内蒙古图书馆抄本
- [9] 姜振青：《多伦县政概要》，康德二年（1935年）
- [10] 临川花楞：《内蒙古纪要》，民国四年
- [11] 《蒙古之商业》，油印本 内蒙古图书馆藏书
- [12] 吴永署，毕遮远：《蒙行随笔》，民国十二年
- [13] 陈赓雅：《西北视察记》，上海申报馆，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
- [14] 东方杂志社：《蒙古调查记》，上海商务印书局，民国十四年（1925年）
- [15] 下村修介：《蒙古地志》，南京启新书局，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
- [16] 何建民：《蒙古概观》，上海民智书局，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 [17] 平绥铁路管理局：《平绥》，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
- [18] 交通部平津区张家口分区接收委员办事处：《平绥铁路概况》，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

方志、文史资料

- [1] 《口北三厅志》，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 [2] 《察哈尔省通志》，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 [3] 《万全县志》，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 [4] 《阳原县志》，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 [5] 《怀安县志》，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 [6] 《张北县志》，内蒙古大学图书馆藏本
- [7] 张家口政协：《张家口文史资料》，第13辑（工商史专辑）

- [8] 任月海：《多伦文史资料》，第一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年
- [9] 任月海：《多伦文史资料》，第二辑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
- [10]卓孔铭：《多伦县志》，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发行，2000年
- [11]张魁义：《锡林郭勒盟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年
- [12]居风库等：《锡林郭勒盟商业志》，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6年
- [13]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广西师范大学1997年

游记

- [1] 中华书局：《新游记汇刊》，民国十三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 [2] 姚祝萱：《新游记汇刊续编》，民国十二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 [3] 周颂先：《京绥游记》，民国十二年（1923年），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 [4] 马鹤天：《内外蒙古考察日记》，新亚细亚学会大陆印书馆，民国二十一年出版

报刊杂志

- [1] 地学杂志：《新开之七商埠》，民国四年第十期；《察哈尔乡土志》，民国五年第6、7合期
- [2] 东方杂志：《多伦诺尔记》，《多伦诺尔厅调查记》
- [3] 边疆半月刊：《察省各地皮货市况》，第1卷第4期，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日
- [4] 边事研究：《边事记略—经济》，卷1第2期，民国二十四年1月
- [5] 开发西北：《察绥专号》，第三卷 第一二期合刊，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
- [6] 禹贡半月刊：第七卷 第八九合期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一日出版

日文资料

- [1] 多伦县公署编：《多伦事情概要》，康德二年（1934年）
- [2] 谷健次：《新生蒙古的首都—张家口风土记》，东京秀文阁书房，1938年
- [3] 蒙疆调查联合会：《张家口概况》内蒙古图书馆藏本
- [4] 佐腾晴雄：《多伦、贝子庙并大板上庙会事情》，铁路总局文书课，1935年
- [5] 经济情报周刊刊载：《张家口张多关概况》，1936年
- [6] 支那驻屯军司令部：《察哈尔省地志》，1933年
- [7]内陆亚细亚研究：张家口研究 1939年
- [8]黑龙江档案馆：《满铁调查报告》，第一辑、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专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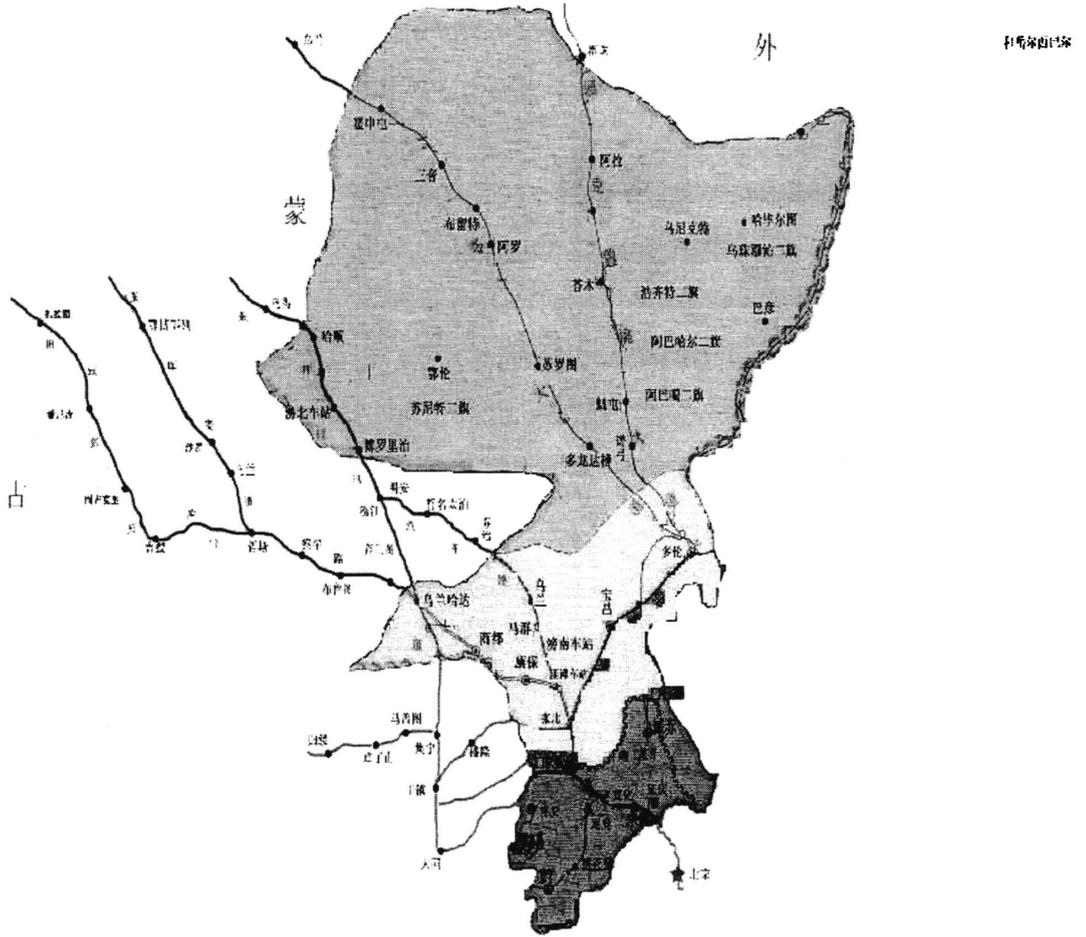
- [1]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12月

- [2]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5年
- [3]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9年
- [4] 闫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民族出版社，2004年
- [5]乌云格日勒：《十八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年
- [6]黄丽生：《由军事征掠到城市贸易：内蒙古归绥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14世纪中至20世纪初）》，台湾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出版，1995年
- [7] 卢明辉，刘衍坤：《旅蒙商：17世纪至20世纪中原与蒙古地区的贸易关系》，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
- [8]卢明辉：《清代北部边境民族经济发展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
- [9]马汝珩，成崇德：《清代边疆开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 [10]金巴扎布：《察哈尔蒙古族史话》，丰镇印刷厂，1989年
- [11]徐建生：《民国时期经济政策的沿袭与变异（1912—1937）》，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 [12]李竹青，石通扬：《少数民族地区边境贸易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年
- [13]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
- [14] 隗瀛涛：《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四川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5]施坚雅：《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0年

论文

- [1]牛敬忠：《清代至民国时期中央政府对察哈尔地区行政控制的加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 [2]孟晋：《民国初年商业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河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 [3]许檀：《清代前期北方商城张家口的兴起》，《北方论丛》，1998年，第5期
- [4]乌云隔日勒：《清代边城多伦诺尔的地位及其兴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0年，第2期
- [5]高亚利，刘清波：《多伦汇宗寺的兴起及其演变》，《文物春秋》，2004年，第5期
- [6]房昌建：《清以来蒙古贝子庙及历世活佛考》，《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
- [7]杨文生：《平绥铁路与商人的迁移及其社会影响》，《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
- [8]钱占元：《旅蒙商的兴衰》，《塞外春秋》，2005年，第6期
- [9]李丽娜：《京绥铁路与大同城市近代化进程》，《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 [10]乌廷玉：《解放前北方农村集市贸易》，《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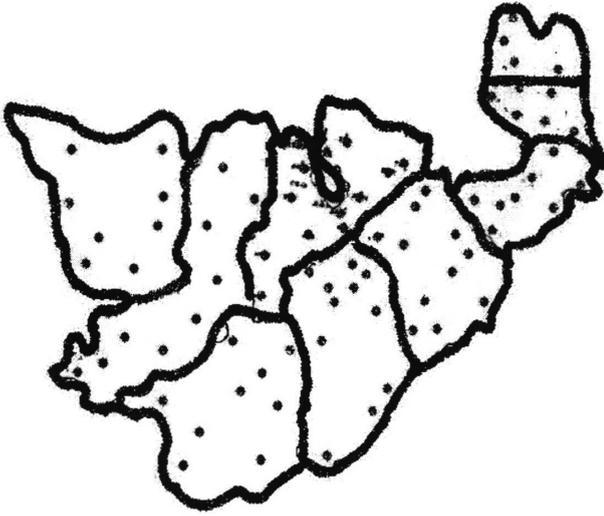
附录一：察哈尔主要贸易交通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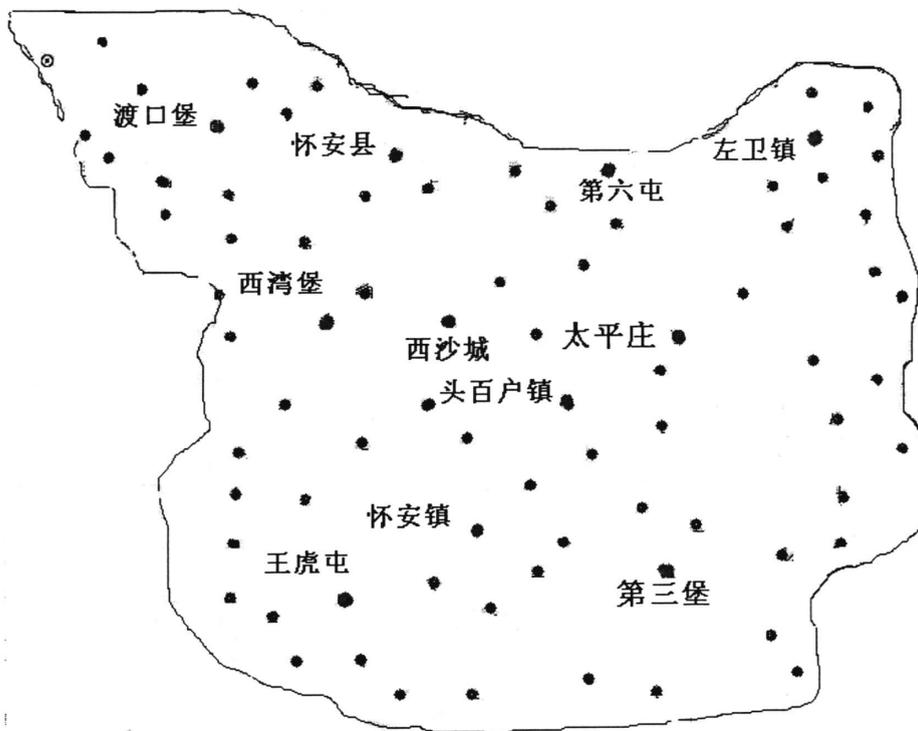
附录二：南部贸易经济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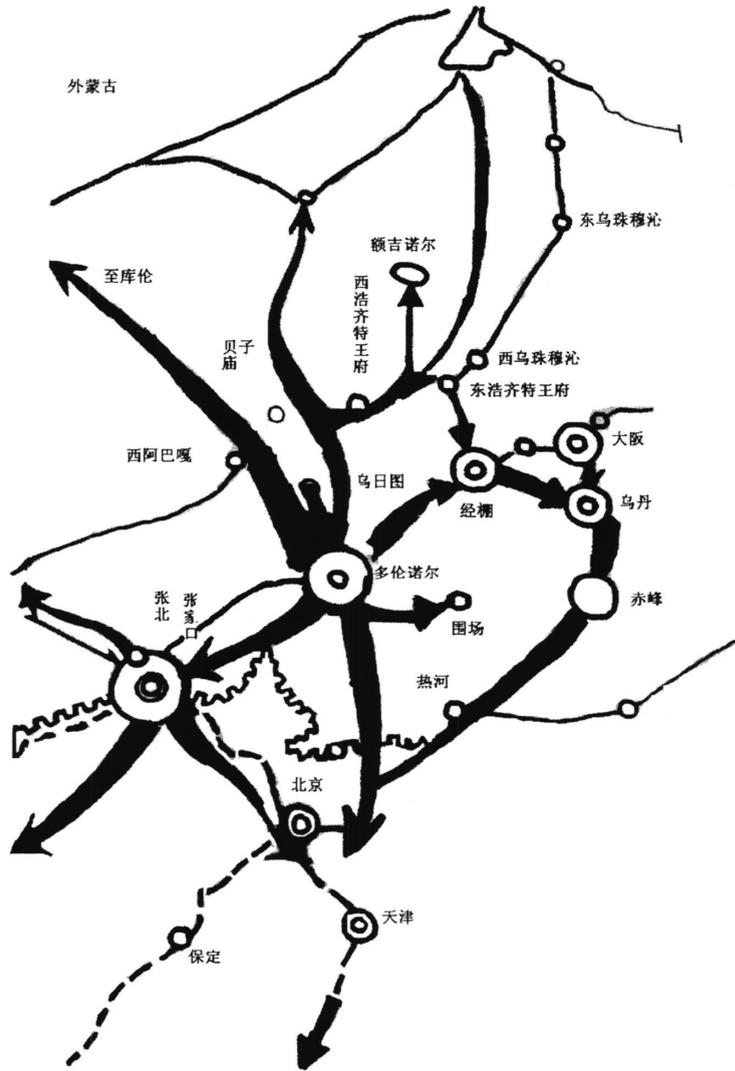
附录三：南部贸易经济贸易区主要乡镇图



附录四：南部经济贸易区怀安县乡镇集市图



附录五：多伦诺尔市场辐射图



附录六：贝子庙市场贸易图



致 谢

转眼间，我的学生时代就要结束了。我已经在内蒙古大学度过了七个年头，七个年头，时间不短，从本科到研究生，七年的成长，七年的收获。特别是三年的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更让我受益终生。

在这三年的研究生学习中，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导师——牛敬忠教授。本人论文能够得以顺利完成，离不开牛教授长期以来的严格的学术训练，离不开牛教授讲求学术有专攻的的教诲。在牛教授的指导下，尝试区域性质的研究。毕业论文的每一过程都凝结着牛教授的心血。在撰写毕业论文过程中，牛教授提供了大量的书籍和文献资料，耐心指导论文架构，提供了很多宝贵建议。此外，还要感谢张凤祥教授，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高度的敬业精神对我影响很深。陶继波副教授渊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给了我深深的启迪，并感谢陶教授提供的相关珍贵资料。李玉伟副教授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学术态度对我影响很大。在此，真诚的向您们道声谢谢。

此外，在我收集资料过程中，张家口市图书馆的老师给予我很大的方便和帮助，使我顺利完成史料和研究成果的收集。感谢张家口市刘振英老师为本人提供相关信息，感谢多伦县文联主席任月海老师提供日文资料。

最后，感谢我的同门，你们和我一路走来，让我感到很温暖，谢谢你们给我的支持和帮助。

付丽娜

2008年5月于内蒙古大学